海外清史

1949年以前法国的清史研究

巴斯蒂 著　王文婧 译

本文中“法国的清史研究”指的是在法国出版的法文著作，以及法国籍作者用外文在外国出版的著作。这里不讨论在其他国家以法语进行的研究，比如比利时、瑞士或加拿大研究者在各自国家出版的著作。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正在进行的海外清史研究出版工作主要集中在 1912 年清朝灭亡后的研究作品。然而，如果不参考自清王朝建立以来法国人着意搜集积累的清代文献和研究，就很难理解 1912 年以后出版的有关这一主题的法语论著。正因为目前并没有 1644 年至 1912 年法国在清朝知识方面的总体研究，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回顾一下法国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初关于清朝研究的主要体制框架和发展方向。

法国的清朝研究最初源于 17 世纪中期法国知识界、受教育民众和国家上层人士普遍的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渴求。不过，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并非他们唯一关注的对象，非洲、穆斯林世界、印度或是美洲也在他们的兴趣范围当中。这种探索异国的热情也并不仅限于法国，整个欧洲都是如此。它较早开始于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但在法国和英国更为盛行。到了 17 世纪末，这种热情更是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大陆所有国家都囊括其中，并推进了这些国家间的文艺和学术交流。

17、18 世纪，法国的清史研究已凸显优势。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们系统搜集了一手的汉文甚至是满文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得到法国王室政府资助维持并由一些学者——尤其是有中国文人帮助的耶稣会传教士——推动的研究中心在巴黎和中国的活动。这一时期积累的涉及清朝历史的文本、翻译资料、实地观察报告和论著，直至 19 世纪末仍在法国乃至欧洲的学术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前半期，法国与中国的学术来往中断，欧洲学者很难得到新的史料。

在法国，清朝研究从 19 世纪初开始进入大学体系，1814 年，法兰西公学院就设立了汉、鞑靼和满族语言与文学教授座席。法国清朝研究的独特性可见一斑。因为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在巴黎，职业汉学研究发展起来；而与此同时，由于外交关系建立而出现的研究者向中国本土的回归也引发了重要的革新。传教士一直是中国研究的信息来源，但与上个世纪相比，他们的优越性日减，学术抱负也不复远大。继传教士之后，政府官员、军官、商人、记者和政论家被当时清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吸引，在中国本土形成了新的实践型专家群体。1885 年，法国对越

[收稿日期]　2019-09-21
[作者简介]　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1940 —），女，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法国国家科学院名誉研究员，mbastid@orange.fr；王文婧（1983 —），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北京 100872，wangwjhis@ruc.edu.cn

南东京（Tonkin，即越南北部，中国亦称北圻）的征服有力地推动了这场运动的发展。与中国接壤的印度支那归属法国也使得对清帝国感兴趣的公众和社会活动者有了快速增长。与之相关的岗位、刊物和专门机构增多，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和学生也来到法国，参与到知识的传播中。人们的认识同样出现了变化。清帝国的对外关系史成为学术热点，对清朝制度、文学和艺术发展的考证与批判性研究也开始进行。不过，当时学者的首要关注点却在于这个帝国的多样性以及它从另一个时代承袭的政治结构的脆弱和缺陷。

从 1912 年清朝覆灭直到 1949 年，法国涉及清朝历史研究的体制框架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虽然 1920 年索邦大学创立了汉学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1936 年北京（北平）设立了中法汉学研究所（Centre franco-chinois d'études sinologiques），但这两项重要的创制主要惠及对古代中国的研究。1912 年帝制的废除催生了许多充斥着大量新讯息的著作，以帝国最后几年的发展演变和革命运动的形成、发动及认知为主题的分析评论也相继出现。这些出版物的作者大部分是内行且熟知情况的记者，不过从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占据时事焦点后，他们也转向了其他主题。在法国，本地清史研究主要由留法的中国学生接续，1912-1949 年间有一百多篇论文都涉及这一主题。这些论文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有些已经开始探索新的领域，如研究著名的小说，探讨地方管理和机构运行等问题。其中最好的成果要归功于汉学研究所爱德华·梅斯特（Edouard Mestre）的帮助。而法国本土的研究者——除了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最后的几部作品外——都放弃了对清朝政治史的研究，转而关注这个王朝宗教人类学方面的问题，深入探究那里的艺术发展演变，试图从技术层面理解某些法律和医学问题。不过，1914-1949 年间，在法国甚至中国出版的关于清代数量最多也最具原创性的法语著作其实都出自身居海外的法国人之手。它们是研究的一些基础工具书：文本的译注合集、传记汇编、书目索引和词典。此外，还有对艺术和文学遗产、城市和地方历史、各少数族群、对外交往和天主教福音传教历史的学术调查研究。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由于中国政府不再允许学者到中国进行科学研究，法国学界对中国尤其对清史的研究又变得非常困难。但尽管有这重障碍存在，各项调查研究并未就此停止，反而重新启航。一些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利用法国、欧洲、日本和美国图书馆及档案馆积累的丰富文献，借鉴法国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路径对清朝进行了更加专门而深入的研究。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赖于国家科学院和各大学机构开放的职位，以及能够在台湾——1980 年后主要在中国大陆——补充资料和完成他们的培养，这批专业研究者的数量逐渐增加，能力得到了肯定，研究主题也愈发细化。在法国汉学界，清代研究成为一个无论在学术还是技术层面都十分独特的领域，其强项在于对国家建构及国家治理的研究，对中国与欧洲交往的研究，对中国社会与宗教运动的研究，以及对知识、思想及其传承和方式的研究：教育、书籍和视觉文化。不仅如此，这些法国研究者的著作也十分国际化，其中的很大部分都是在法国境外直接以其他语言出版的。

一、17、18 世纪：学者的兴趣

从 1644 年清军入关开始，对于这个当时仍被称为鞑靼的新兴王朝以及中华世界在其统治下所发生转变的研究已经在法国引起了学者、官方和广大文人的极大兴趣。出于这样的兴趣，官方和私人都在搜集能够提供有关清帝国人物和事件信息的所有文献。1647 年，向公众开放的马扎然首相图书馆有 4 套中文书籍，共计 19 册。同时，该图书馆还购得了欧洲所有关于中国的出

版物。[①] 该馆第一任管理员诺德（Naudé）订立了一条为全法学术图书馆沿用的规则，即同时要搜集原文文献和这些文献的最好译本。[②]

第一本记载满人征服战争的欧洲著作出自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之手，它的法文译版于1654年在巴黎出现，同一时间安特卫普也出现了这本书的拉丁语第一版。[③]这本书后来历经多次修订再版。与之情况相同的，还有这位作者的中国地图集[④]以及帕莱福（Palafox y Mendoza）与聂仲迁（Greslon）分别在1670年和1671年出版的关于鞑靼征服史的论著。[⑤]自1650年开始，法国作者所著或从其他文字翻译过来的与清帝国相关的游记、回忆录以及描述性和分析性的著作大受欢迎，填满了私人和研究机构的图书馆。

1. 巴黎的研究中心：国王图书馆（Bibliothèque du Roi）与克莱蒙学院（Collège de Clermont）

对清朝的研究首先是以国王图书馆（当时的图书馆坐落于维埃纳大街，后迁至马扎然旧宫，即目前的所在地）为中心开展的。1668年，图书馆接收了马扎然收集的中文书籍，1692年开始向公众开放。此时的图书馆已经配备了带薪馆员以便进行学术活动。1684年，来自中国的天主教年轻学者沈福宗与柏应理（P. Couplet）一道觐见了国王路易十四并成为其座上宾。他协助柏应理和图书馆员泰弗诺（Thévenot）编写了汉文读写课本《汉语初步》（*Clavis sinica*），对解读皇家图书馆（即国王图书馆）悉心搜集的中文书籍助益良多。从1687年开始，北京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寄回国的文献越来越多，极大促进了资料的积累。到1722年，皇家图书馆已经收集了数百套汉语书籍，近6000册，其中文收藏已经是欧洲之最。[⑥]除此之外，图书馆还保存着派驻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和报告，尤其是耶稣会士定期向法国科学院（l'Académie des sciences）寄送的记录文档（mémoires）。不过，皇家图书馆在清代研究方面的促进作用更多在于它搜集到大量以欧洲各种语言撰写的与中华帝国相关的作品和译著的印刷版或手稿，而较少在于搜集中文资料，因为那个时期能读中文的法国学者极少。

巴黎另一个研究清帝国的重镇是克莱蒙学院（即现在索邦大学旁边的路易大帝中学）。这座属于耶稣会的大型建筑在那时不仅容纳了一座非常著名的中学，还是北京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团隶属的耶稣会法国修会省的驻地。在华法国耶稣会士的官方或私人报告、信件、教会文档都

---

① 亚纳·索尔代：《1650年马扎然图书馆“向公众捐赠”的第一份文书》（Yann Sordet, “Le premier acte de” donation au public‘de la bibliothèque de Mazarin (1650)”,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du livre-Revue internationale*, Genève: Droz, 2014, Vol. 10），第93-111页；亚纳·索尔代：《惹人垂涎的书籍：马扎然图书馆的希伯来语和犹太文化文献收藏》（Yann Sordet, “*Des livre fort convoités: les hebraica et judaica de la bibliothèque de Mazarin*”, Paris, 2017），第7页。

② 加布里埃尔·诺德：《关于建立图书馆的建议》（Gabriel Naudé, *Advis pour dresser une bibliothèque*, Paris: Targa, 1627），第38-39页。诺德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应该把古今所有值得研究的作者都囊括其中，且文献应以这些作者原本所使用的母语或方言的形式呈现……（比如）阿维森纳的阿拉伯语典籍……但丁的意大利语作品。”

③ 卫匡国：《鞑靼对华战史》（《鞑靼战纪》）（Martino Martini, *Histoire de la guerre des Tartares contre la Chine*. *Contenant les révolutions étranges qui sont arrivées dans ce grand royaume depuis quarante ans*. Traduite du latin du P. Martini,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Paris: J. Henault, 1654），可参见戴寅的中译本，《清史译文》（内部资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资料室编）1980年第1期。

④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Martino Martini, *Novus atlas sinensis*, Amsterdam, 1655）。这本书中包含了中国各省的地图，还附注了对于各省的详细说明。1655年开始，泰弗诺（Thévenot）以《中华帝国地理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de l'empire de Chine*）为名出版了这本书的法文版。

⑤ 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Histoire de la conqueste de la Chine par les Tartares*. *Contenant plusieurs choses remarquables touchant la religion, les mœurs et les coutumes de ces deux nations, et principalement de la dernière*. *Écrite en espagnol et traduite en français par le Sieur Collé*, Paris: Antoine Bertier, 1670）；聂仲迁：《鞑靼统治下的中国历史》（Adrien Greslon, *Histoire 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 Paris: J. Henault, 1671）。

⑥ 娜塔莉·莫奈：《从马扎然到贝尔坦：1668-1793年间皇家图书馆中文藏书的飞速发展》（Nathalie Monnet, “De Mazarin à Bertin, l'essor de la collection chinoise de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entre 1668 et 1793”, in Marie-Laure de Rochebrune, comp., *La Chine à Versailles*. *Art et diplomati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Somogy, 2014），第140-145页。

会寄送并保存到这里的图书馆，其文献非常丰富，且向学者开放。另一部分来往信件——一般以年为单位，有时也不定期汇总——会被送到圣安托万街的修院（即如今的查理曼中学），由那里的耶稣会神父（通常是曾经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择选整理，并定期在《教化奇事信札》（*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上发表以飨广大民众。这里的另一些耶稣会神父则致力于使用来自北京的著作和汉语文献，编著具有普及性质的博学之作，比如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735 年在巴黎出版的四卷本《中华帝国及鞑靼地理、历史、编年、政治和风物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又译为《中华帝国及鞑靼地区地理、历史、编年、政治和自然之描述》，或简译为《中华帝国全志》）。这本书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极大反响。然而，随着 1764 年耶稣会在法国被取缔，所有财产均遭没收，克莱蒙学院图书馆的书籍和手稿也被查封，甚至经过拍卖进而散失，使得法国学人痛失这一宝贵资源。保存在圣安托万街的大量手稿先是被转移到圣莫尔（Saint-Maur）的本笃会，放置在向学者开放的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l'Abbaye de Saint-Germain-des-Prés）图书馆。1794 年，部分手稿被大火焚毁，剩余部分则在 1795 年由刚刚从皇家图书馆更名而来的国家图书馆收藏，并保存至今。[①]

1764 年耶稣会在法国被镇压以后，所有来自中国的讯息开始由国务秘书贝尔坦（Bertin）接收。而格鲁贤修道院长（l'abbé Grosier, 1743-1823）正是在圣日耳曼德佩图书馆、皇家图书馆和贝尔坦府邸进行他的研究。这位前耶稣会士还在主持冯秉正（De Mailla）神父于北京编译，从 1737 年开始陆续寄回法国的《中国通史或帝国年鉴》（*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的出版工作。1777 年至 1783 年，这套从汉文或满文翻译而来的书籍在巴黎出版了十二卷四开本，并附有许多地图和插图。[②] 它的前十卷译自《通鉴纲目》，第十一卷则根据《通鉴纲目》续著和其他材料叙述清朝历史。为使用最新的信息增补冯秉正的著述，格鲁贤亲自撰写并于 1785 年出版了这套书的第十三卷（798 页），题为《根据北京传道团记录编写的中国或中华帝国通史全志，内容包含：1. 中华帝国、鞑靼地区和其他附属国共 15 个行省地志，城市数量等等；2. 欧洲得到的关于中国政制、宗教、法律、风俗、科学以及艺术所有情况的报告》（*De la Chine, ou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cet empire, rédigée d'après les Mémoires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ouvrage qui contient : 1° la Description topographique des quinze provinces qui composent cet empire, celle de la Tartarie, des lieux et des États tributaires qui en dépendent; le nombre de villes, etc. ; 2° l'exposé de toutes les connaissances acquises et parvenues jusqu'en Europe sur le gouvernement, la religion, les lois, les mœurs,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这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很快就被译为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分别重新修订出售。1818 年至 1820 年，格鲁贤又重新对这本书做了审阅和增补，形成七卷八开本（3450 页）出版。正是因为格鲁贤所做的这些工作，欧洲民众在此之后才得以直接接触到众多涉及清帝国历史、政治思想、管理模式和社会状况的中文文献。

2. 北京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和广州领事馆

法国第三个关于清帝国研究的中心在北京，由路易十四创立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团主导。1685 年，路易十四在巴黎接见柏应理，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出资向中国派遣六名法国耶稣会士，成为法国科学院的通讯人。其中五名于 1688 年 2 月到达北京。康熙皇帝为答谢他们在各项工作

① 关于源自圣安托万街的手稿收藏，参见蓝莉：《中国的证言：1735 年耶稣会士杜赫德的志书》（Isabelle Landry-Deron, *La preuve par la Chine. La "Description" de J.-B. Du Halde, jésuite, 1735*,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2），第 30-35 页。

② 1775 年，当保存冯秉正手稿的里昂耶稣会被驱逐时，格鲁贤购买了这些手稿使之免于散失或被毁坏。它们如今被收藏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与之一同被收藏的还有格鲁贤留下的关于冯秉正新译本的手稿。新版本采用了新的风格，在事件的选择和表述上也做了改动，以使这部中国史更具现代形式。

中为宫廷提供的出色服务，尤其在用金鸡纳霜救了自己之后，将皇城中的一块土地赏赐给了他们。1693 年，耶稣会士开始在此修建教会驻地，其中包括一座占地极广的图书馆，此后又兴建了被称为“北堂”的教堂，于 1703 年开放。1699 年，其他的法国耶稣会士应康熙皇帝邀请陆续到达中国。[①] 至 1775 年耶稣会在世界各地被罗马教廷解散的消息传入中国为止，[②] 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共计 114 人，他们的旅行费用由法国王室财政支付，此外每人还能获得一份年金（每年约 470 两白银）和各类津贴。早在 1700 年，教皇已认可中国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团独立于葡萄牙传教团，并同意其完全隶属于上级的法国修会省。为了服务朝廷，传教团开展了大量多样的科学活动，且一直与法国甚至是整个欧洲的学术界保持联系。教团不仅搜集传递了各国进行清朝研究所用的大部分资料，还编著了许多重要著作，比如前面提及的冯秉正所著的《中国通史》。

虽然 1764 年耶稣会在法国遭到了查禁，但法王对在华法国耶稣会士的资助却并未中断。不过自此之后，向他们询问中国各方面情况并接收他们传回的资料、信息、相关著作和信件等事务就被纳入国务秘书贝尔坦的工作范围。作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贝尔坦对中国颇为着迷，也尽力使他所知情况能够在欧洲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有赖于他个人在欧洲极为广阔的学术关系网络，还得益于 1776 年至 1789 年间陆续出版的十五卷《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见闻录》（*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et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1773 年，教皇决定取缔耶稣会后，法王路易十六虽继续对留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提供支持，但法国在京传教团却由他派遣的遣使会会士（les Lazaristes）接手主持。不仅如此，1776 年，路易十六在广州设立领事馆，由此，中国南部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中心。广州领事馆的领事往往常驻澳门，但他仍需要学习中文，传递讯息。从 1783 年开始，定期向贝尔坦汇报中国情况的是年轻的领事德基涅（de Guignes）。

然而，法国大革命、1792 年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对抗整个欧洲的战争将法国人在中国开创的学术事业毁于一旦，巴黎和北京的珍贵收藏或被销毁或遭散失。而在法国，君主制的中国也不再为开明之士关注。1789 年以后，在中国的传教士和领事再也得不到任何来自法国的钱款。英国切断了法国和中国的海上联系。1811 年，最后一位在华耶稣会士在北京去世。1827 年，清政府收回并拆除北堂。德基涅于 1801 年回到巴黎，1813 年在拿破仑的资助下出版了他的《汉法拉丁辞典》（*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这位皇帝也曾萌生重新恢复中法联系的想法，却被战争阻住了脚步。

二、1814 年至一战前：国家和学院层面中国研究的新体系，及以实地与时事考察为先的研究进展

对中国的重新关注和研究始自波旁王朝复辟，由法王路易十八开启。这位国王将关于满汉的研究纳入到大学体系中，于 1814 年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为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创设了汉语、鞑靼语 - 满语语言文学教席。之所以选择雷慕沙，一方面是基于法兰西公学院阿拉伯语教授西尔维斯特·德·沙西（Silvestre de Sacy）的推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雷慕沙的父亲曾忠心耿耿为路易十六服务。

---

① 康熙帝派遣一位神父回法国召唤更多的同伴专家，1699 年共有八人随这位神父到达中国，此后有更多的耶稣会士到来。——译者

② 1773 年 7 月 21 日，教皇克莱芒十四世（Clément XIV）颁布敕书（*Dominus ac redemptor*）在世界范围内查禁耶稣会，但在华天主教主教们直到 1775 年才收到敕令通告。因此，1773-1774 年间仍有耶稣会传教士到达中国，直到 1775 年查禁耶稣会的命令才在中国实施。

1. 法国的职业汉学

整个 19 世纪，中国研究——包括清朝研究——在法国的发展主要是在公共教育的范围内进行的。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有赖于一些教授中国知识的专门教席的设立，其次则归功于一些学术团体和杂志对相关研究的定期发表和传播。

《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和法国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于 1822 年成立，由西尔维斯特·德·沙西任主席，雷慕沙担任秘书。1829 年，它们的创立得到国王法令的确认。从 1824 年开始，雷慕沙还担任了皇家图书馆东方善本书室的管理者。他对这里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整理，将古代历史文献翻译成法文，出版了涉及诸多领域的著作，如汉语语言、古典文学，以及清代中国的行政设置、地理和经济等。除此之外，他还培养了一批专业学生。七月王朝继续为汉学研究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体制基础。1839 年，为满足与中国人交流的需求，法国政府建议东方语言学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设立"通用汉语"教席，培养翻译和口语人才。但被学院教授拒绝。1841 年，雷慕沙的学生安托万·巴赞（Antoine Bazin）首开这一课程，"通用汉语"教席继而于 1843 年得以设立。然而，学院的课程旨在书面的学术，而不在于为学生能够直接接触中国或中国人做相关准备。

1832 年，斯塔尼斯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9-1873）接替雷慕沙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职位。此人坚决反对教授他终其一生也未能掌握的汉语口语。虽然儒莲在古代中国研究领域学识渊博，令人敬佩，但他性格糟糕，妒忌心重，虚荣自负，爱施手段，且为人贪婪专横。他设法垄断了所有职位，并在学术团体中排挤所有潜在的竞争者。为了招募汉语翻译，外交部只能绕过这一障碍，任用一些欧洲的传教士或是马尼拉混血儿，从 1860 年开始他们甚至派遣极为年轻的法国人到中国本土去学习。直到 1871 年 12 月，法兰西铭文与文学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才与公共教育部和外交部采取强硬措施，扶持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多年的外交部翻译哥士耆（Kleczkowski，又译作哥士奇）接替八年前上任的儒莲，成为东方语言学院通用汉语讲席教授。而事实上，直到 1872 年儒莲去世之前，东方语言学院才得以开设关于远东国家地理、历史和法律的课程，由颇节（Guillaume Pauthier, 1801-1873）讲授。1881 年，高第接手这一课程，1888 年这一独立教席最终得以设立。可以说，巴黎直到 1872 年才出现了能够为研究古代和当代中国提供所有必需的语言和科学技能的完整的专业汉学研究培养体系。

2. 中国本土的法国研究者

自 1844 年起，因为外交关系的建立，中国本土重新成为法国汉学研究的中心，但这个过程非常缓慢且与之前的形式有所不同。其中的积极参与者仍然是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先是在上海，1860 年后也在献县），还有北京的一些遣使会会士。然而与 18 世纪相比，这些传教士无论在物质条件、时间还是学术联系方面都较为欠缺，因此学术研究无以为继。不过他们开办的学校却在向年轻的中国人教授法语，后者不久就参与到了法国汉学家的研究当中。此外，传教士们的信件——内容多是他们在中国见证的人们的生活和一些事件——会定期发表在传播甚广的天主教刊物上，例如季刊《传信年鉴》（*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或月刊《圣婴善会年鉴》（*Annales de l'oeuvre de la Sainte-Enfance*）。这些著述使得清后期的中国为更多法国民众熟知。其中一些以书籍形式出版的记述直到今天仍是重要的历史证据，如翁毅阁（Broullion）关于太平军到达江南的记载。[①]

此外，法国派驻中国的外交、军事、行政甚至是商务人员也参与到研究当中，并得到法国文化和学术群体的高度关注，这是法国人在中国本土研究的一个新现象。不少法国常驻人员汉语很

---

① 翁毅阁：《江南教会现状录》（直译为《中国传教会：江南传教团 1842-1855 年关于当时状况的记录，随附有关 1851-1855 年起义的信件》）（Nicolas Broullion, *Missions de Chine. Mémoire sur l'état actuel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1842-1855, suivi de lettres relatives à l'insurrection* 1851-1855, Paris, 1855）。

好，对中国和中国人感兴趣。他们搜集、传递信息和文献档案，与中国不同领域的人士有私交，有些人还将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一些见识广博的旅行者也对此做出了贡献。法国“广大民众”对清末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普遍了解以及知识界对这些问题的学术认知均由此而来。尤其到了1860年以后，法国的日报、图文报纸及文学、文化和政治刊物都会定期发表文章传递关于中国过去与现在的各类信息，登载一些汉语诗歌、故事、新闻的翻译。1873年9月，第一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在巴黎召开，法国学者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此后，这样的盛事每两年举办一次，为组织和增强欧洲汉学界的沟通交流提供了助益和便利。

3. 法属印度支那的重要作用

1885年东京征服事件打破了法国汉学的现状，加快了汉学界的研究步伐。征服东京使法国的殖民统治扩展到整个越南及柬埔寨、老挝等周边国家。法属印度支那从此与中国毗邻，殖民体制在越南常常需要倚赖的文人文化和这个国家过去的行政架构，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国政府希望能够赢得新殖民地不同地区重要且活跃的中国群体的支持，因此就需要有懂得汉语、了解华人世界，且能清晰准确把握中国现实状况的人员提供服务。这些对理论和实践专业技能的新需求在议会和媒体上被广泛讨论，催生了新的志愿和主动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1886年，刚刚进入高等师范学院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就在院长[①]的建议下开始学习汉语。1889年，他成为第一个得到公共教育部资助到中国进行长期研究的学者。作为法国驻北京公使团随员，他每月寄回一封通讯发表在主流报纸《时报》（*Le Temps*）上。1893年，沙畹击败对手著名学者、日本问题专家莱昂·德·罗斯尼（Léon de Rosny, 1837-1914）成功入选法兰西公学院，担任汉语、鞑靼语-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席教授。罗斯尼在东方语言学院任教，是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创始人。他在1886年创办的以培养殖民地官员为宗旨的殖民学院教授“书信汉语”，同时还负责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PHE）宗教科学分部1886年开设的新科目“远东和印第安美洲宗教”。这是该著名学府开设的第一门东亚研究课程，不过罗斯尼在这里主要讲授日本佛教思想。1908年，罗斯尼退休，沙畹接替他成为远东宗教（印第安美洲领域此时已不再包含在内）讲席教授。他一边继续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课程，一边还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教授古代中国宗教、中国佛教起源和道教等内容。1912年，沙畹辞去了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职位，以确保他刚从北京回国的学生葛兰言（Marcel Granet）能够在第二年接替他的位置。然而，葛兰言于1914年应召入伍，直到1919年才开始以其独特的方式——将古代和当代文本放在一起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式进行解读——训练年轻学者。

一份重要的专业学术期刊和新机构的出现进一步增强和拓宽了东亚研究科学培养和活动范围。高第与他的荷兰同事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于1890年共同创立了《通报》（*T'oung-pao*），或称《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中亚和马来西亚）历史、语言、地理和民族学研究档案》（*Archives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e l'histoire, des langues, la géographie et l'ethnographie de l'Asie orientale (Chine, Japon, Corée, Indo-Chine, Asie Centrale et Malaisie)*），成为欧洲汉学主要的科学研究刊物。1898年，根据法兰西铭文与文学学院的计划，法国远东学院（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成立。其章程于1900年制定，总部设在河内。它的使命主要是进行考古勘察、手抄本搜集、文物保护以及研究当时法属印度支那各地区的语言遗产，但它也十分广泛地参与到从印度到日本所有亚洲文明历史的研究当中。学院的成员都是一些定居当地、游历甚广、精通多种语言的年轻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经常去中国，与中国知识界来往密切，能够搜集到大量资料。每个季度的《法国远东学院通报》（*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都会刊登他们关于当代或古代中国问题的深入研

① 即当时高师的院长、著名考古学家乔治·佩罗（Georges Perrot, 1832-1914）。——译者

究。不仅如此，法国殖民政府还在河内开办了各种学院（1886 年设立翻译学院，1904 年建立巴维学校（Ecole Pavie），1907 年建立河内大学），为年轻的越南人和中国人提供欧洲教育或是让殖民地官员接受中国语言与文化培训。这些学院真正成了思想交流的场所，师生之间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现况研究领域建立了持久且富有成效的联系。而在法国本土，进行汉学研究的大学机构也在发展壮大。1900 年，里昂商会（la Chambre de Commerce）为古恒（Maurice Courant, 1865-1935）在里昂大学设立汉语教席。1911 年，法兰西公学院为伯希和设立了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教席。

4. 法国在清帝国进行的重要科学考察

法国在清帝国进行的第一轮长期科学考察跨越了新疆和西藏，首批考察队员于 1889 至 1890 年成行，由邦瓦洛（Gabriel Bonvalot）和奥尔良家族的亨利（Henri d'Orléans）带领，1891 到 1894 年的探险则由迪特勒伊·德·兰斯（Dutreuil de Rhins）主持进行。此轮考察为当时风靡欧洲知识界的中亚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①]1895 年到 1897 年，由里昂商会发起，14 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的大多数省份，并发布了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以大量的数据信息详述了中国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状况。[②] 直到今天，这份报告一直是外国学者研究清末中国经济的参考文献。

1902 年到 1914 年是重要的学术考察遍及中国的时期：沙畹（1907）、勒让德（Legendre, 1902-1912）、多洛纳（d'Ollone, 1906-1909）、伯希和（1906-1908）、巴科（Jacques Bacot, 1906-1908, 1909-1910）、葛兰言（1911-1913）、谢阁兰（Segalen, 1909-1910, 1914, 1917）。这些考察均涉及不同地区的多个省份，[③] 带回了各种出版物上发布的大量文献、考察报告、资料、拓本和照片，也使得法国研究者能够与中国学者实地接触交流。当时，清政府的新政吸引了众多法国工程师、技师、军士、医生和教师，他们被各个企业公司及各省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聘请。海上和陆地运输的增多，特别是能够到达北京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于 1907 年通车，使得记者、政论家（publicistes）和各类旅行者可以更容易到达中国。在中国短期或长期居留的法国人也急剧增加。这些都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但与外交人士和学院派的汉学家小群体没什么关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懂汉语或是有中国朋友协助。这些人与中国各界来往密切，在法国出版相关著作，尤其在法国的期刊日报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各方面发展的文章。

5. 与巴黎的中国年轻学人的合作

在巴黎，汉学家们的合作者是一些训练有素的中国年轻学人。与沙畹一起工作的是张翼枢

---

① 邦瓦洛的考察得到了同伴亨利亲王的父亲沙特尔公爵（le duc de Chartres）的资助，他们带回了许多珍贵的植物标本和照片，后来被保存在自然历史博物馆（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其中一部分照片收入邦瓦洛的著作《从巴黎到东京：穿越陌生的西藏》（*De Paris au Tonkin à travers le Tibet inconnu*）中，于 1892 年在巴黎出版。1894 年 6 月，迪特勒伊·德·兰斯被藏民杀死。但他的地理、民族学和考古笔记以及他收集的罕见的资料文献——尤其是桦树皮上的抄本、新疆晚近的文学作品、一些拓本以及能够填补中亚制图学大量空白的地图集——却留存下来，由他的助手，死里逃生的费尔南·格勒纳尔（Fernand Grenard，又译作李默德）整理并在巴黎出版，即四卷本的《亚洲高地科学考察报告（1890-1895）》（Fernand Grenard, *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Asie 1890-1895*, Paris, 1897-1898）。

② 里昂商会：《里昂在华商业考察团报告：1895-1897》（Chambre de commerce de Lyon, *La mission lyonnaise d'exploration commerciale en Chine, 1895-1897*, Lyon, 1898）。这份报告附有大量图纸、地图和照片。

③ 1907 年，沙畹进行了一次穿越中国东北部的考古考察，从沈阳行至朝鲜，然后跨过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和山西。艾梅 - 弗朗索瓦·勒让德（Aimé-François Legendre, 1867-1951）大夫在成都建立了医学院，并在这里主持法国医疗救济团。他在四川、云南和西藏边缘地区进行了多次医学、民族学和地理勘查。1906-1909 年，由公共教育部提供资金，亨利·多洛纳（Henri D'Ollone, 1868-1945）少校主持了旨在研究中国的非汉族民众及其文化的考察，范围涉及四川、云南、西藏、甘肃和蒙古。1906 年至 1908 年，伯希和的考古考察从新疆进入中国，经过甘肃、陕西至北京结束。同一时间，年轻的藏学家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 1877-1965）对一条古老的朝圣线路——从印度支那经过扬子江上游到达西藏——进行了勘察；1909-1910 年，他回到了云南、四川和西藏交界地区。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 1878-1919）的考古考察同样在 1909-1910 年间进行，他从北京经过山西到达西安，然后横穿甘肃到达成都和重庆，又经由贵州、湖南折回上海。1914 年，他又从北京经直隶、河南到达西安，之后穿过四川进入大理、昆明和河内。1917 年，他在检查法国招募的中国工人体格的同时，对南京和江苏也进行了考古考察。

（字骥先，1885-194？）和唐在复（1878-1962）。1869 年东方语言学院出现了第一位汉语辅导教师，但此时这里的中国文人均学识庸常，对法语一知半解。1862 年与翻译卡勒里（Callery）一同到达的丁敦龄，以及此后不久和一位外交官一起来到法国的李少白，这两人的法语很好，但只有一些文学功底，缺乏真正的学识。①1878 年开设的中国公使馆在中国知识的传播方面几乎毫无建树，除了陈季同 1884 年至 1891 年任公使馆武官那段时间。陈季同的法语极好，因此朋友很多，与法国有影响力的阶层往来频繁，出版了许多介绍中国的法语著作。从 1900 年开始，大量中国学生到法国学习，与大学学术界和上流社会人士有了交流。虽然各人情况不同，但他们都为法国民众了解中国做出了贡献。②

6. 出版物：对清帝国民族多样性的兴趣

总的来说，从 1832 年雷慕沙去世到 1911 年，涉及清朝的法语出版物中，记载 1644 年到 1840 年清朝内部历史的著作极少。那些关于雍正和乾隆皇帝的论著，③以及中国通史里对清朝早期统治者的记述，均由一些并非汉学家的大学教授撰写，它们只是对之前著作的简单删节，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④沙畹在 1894 年到 1902 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la Grande encyclopédie*）中所写的清朝各位皇帝的传记起到了重要的知识普及作用。但最具创见的工作是由法国公使团的两位年轻翻译于雅乐（Camille Imbault-Huart）和莫里斯·冉默德（Maurice Jametel）完成的，他们翻译评注了魏源的《大清圣武记》（*les Saintes guerres des Qing*）。1878 年到 1890 年间，这本书的各个章节被发表在一些期刊（尤其是《亚洲学报》）或文集里。对这本书的翻译表明法国 19 世纪的清朝研究与其对之前的时代和对其他国家的研究是不同的：此时在法国，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清帝国的民族多样性。

事实上，这一时期有一大部分学术考察都是针对非汉族民众和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当时的欧洲学术界正在进行一场整体性、理论性和评论性的运动，要在全面准确了解世界范围内所有社会及它们各自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建立起人文科学，而这些法国学者的研究就是此次运动的一部分。不仅如此，由于殖民地，特别是印度支那的存在，法国的管理就需要面对这些地区众多不同的种族和文化，因此研究清朝及之前各朝代对异族民众的治理方法，了解这些民众——通常与印度支那的族群类型相同——的具体情况，对法国而言是非常有用的。这是法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另一思想原因。这些研究者通常是长期在当地进行调查，搜集最新文献，并向当地文人和士绅显贵请教的领事、翻译官、传教士和武官。他们尤其关注穆斯林民众以及南方省

---

① 关于这些人物的生平，参见安必诺：《1869-1870 年的三位本土辅导教师：李洪芳、李少白和丁敦龄》（A. Pino, "Trois répétiteurs indigènes : Ly Hong-fang, Ly Chao-pée et Ting Tun-ling 1869-1870", in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Paris: Asiathèque, 1995, pp. 275-282）；李声凤：《儒莲及同时代法国汉学家与旅法华人交往考》，《国际汉学》2019 年第 4 期，第 25-32 页。

② 关于巴黎中国公使馆的人员情况和陈季同的作用，参见马骥：《清末法国的中国外交官，1878-1911》（Ma Ji, *Les diplomates chinoisen France à la fin des Qing, 1878-1911*, thèse de doctorat, Université de Paris 7, 2012）；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关于 1912 年之前留法中国学生的情况，参见巴斯蒂：《出国留学与中国近代世界观的形成——略探清末中国留法学生》，李喜所主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22-541 页。

③ 例如福狄亚·于尔班：《论乾隆皇帝，附中华帝国出版资料节选六卷》（Fortia d'Urban, *Discours sur l'empereur Kien-Long, suivi des extraits de six volumes publiés sur l'Empire de la Chine*, Paris, 1841）。

④ 福狄亚·于尔班：《中国及其皇帝属国史志，附地图》（Fortia d'Urban,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et des* états *tributaires de l'empereur, avec une carte*, Paris, 1839, 2 volumes）；奥古斯特·萨瓦涅：《中国史概论，以最杰出的文献为基础》（Auguste Savagner, *Abrégé de l'histoire de la Chine d'après les meilleurs documents*, Paris, 1844, 2 volumes）；颇节：《中国图识》（Guillaume Pauthier, *Chine ou Description historique, géographique et littéraire de ce vaste empire, d'après des documents chinois*. *Première partie, comprenant un résumé de l'histoire et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s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1837）。最后这位作者能够阅读汉语，但他除了对嘉庆和道光统治时期有一个简单介绍外，几乎完全照搬了冯秉正和格鲁贤的著作。

份和西藏边界的各民族。继杜达尔·德·拉格雷（Doudart de Lagrée）和安邺（Francis Garnier，又译作晃西士加尼、安业或嘎业）溯湄公河而上的第一次探险后，出现了德格定神父（l'abbé Desgodins）、埃米尔·罗舍（Emile Rocher，又译作弥乐石）、德韦里亚（Devéria）和邓明德（Paul Vial）的大量研究著作。① 前翻译阿诺德·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在回到法国后任职东方语言学院，成为汉语教授，并于 1908 年到 1914 年出版了专深的《汉学 - 伊斯兰研究》（études sino-mahométanes）论丛。其合作者是管理昆明法语学校且著书研究云南伊斯兰教的乔治·科尔迪埃（Georges Cordier）。② 这些研究的优点在于，它们注重从深刻的历史角度观察理解当前事实，并尽可能深入地进行文献、碑铭和考古研究的搜寻工作。

7. 清帝国对外关系、人口及政治、法律和经济体制研究

法国学者偏爱的另一个主题是清朝的对外关系。高第仔细梳理欧洲档案后，详细描述了清朝中法关系各个阶段发生的事件、当时的环境和相关人物。此外，他还探讨了中国与其他外国势力的关系以及在华各国关系情况。③ 德韦里亚描绘了中越关系。④ 这些研究中最出色的要数精通汉语、俄语的加斯东·加恩（Gaston Cahen, 1877-1944）1911 年在巴黎答辩通过的国家博士论文⑤，其主题是彼得大帝时期的中俄关系。这篇论文是加恩搜集大量文献，进行广泛研究和实地调查的结果，是长期以来研究这一问题最重要的参考著作。⑥

为了满足法国在中国外交和贸易活动的需要，一些以汉学为业的作者研究了中国的人口数

---

① 杜达尔·德·拉格雷、安邺：《1866、1867 与 1868 年印度支那探险记》（Doudart de Lagrée, Francis Garnier, *Voyage d'exploration en Indo-Chine effectué pendant les années 1866, 1867 et 1868*, Paris, 1873, 2 volumes et un atlas）。1875 年左右，大概是在日意格（Giquel）的建议下，丁日昌将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用于个人收藏，将之命名为《柬埔治以北探路记》（柬埔治即柬埔寨——译者）。1884 年李文田出版了这一译本的抄本，https://www.wdl.org/zh/item/18715/，2017 年 8 月 21 日，高第：《中国书目》（H.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Paris, 1904-1924, 5 volumes, pp. 329-330）。德格定：《1855-1870 年西藏传教，包含西藏的各种文献及宗教事务的报告，并附西藏地图》（Auguste Desgodins, *La Mission du Thibet de 1855* à *1870*, *comprenant l'exposé des affaires religieuses et divers documents sur ce pays, accompagnés d'une carte du Tibet*, Verdun, 1872）。埃米尔·罗舍：《中国云南省志》（Émile Rocher, *La province chinoise du Yunnan*, Paris, 1879）。罗舍在这本书中详细探讨了回民的情况及他们的暴动起义。加布里埃尔·德韦里亚：《中国与安南边境》（Gabriel Devéria, *La frontière sino-annamite*, Paris, 1886）。邓明德：《倮倮的历史、宗教、语言、风俗和文字》（Paul Vial, *Les Lolos, histoire, religion, langue, mœurs, écriture,* Shanghai, 1898）。从 1868 年开始，以德格定和邓明德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在《天主教传教团》（*Les Missions catholiques*）周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藏人、苗人（Miaozi）、客家人和彝族的信件与文章。

② 这些研究发表在《穆斯林世界杂志》（*Revue du monde musulman*）上。高第也将之编入了他的《中国书目》中，参见高第：《中国书目》（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Paris, 1904-1924, 5 volumes, pp.3783-3785）。

③ 关于这些主题，高第发表了百多篇文章。他的论著主要包括《18 世纪法国在中国》（*La France en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883）、《1860 年对中国的远征》（*L'Expédition de Chine de* 1860, Paris, 1906）、《18 世纪中国在法国》（*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10 ），特别是三卷本《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1860—1900》（*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Paris, 1901-1902）。

④ 加布里埃尔·德韦里亚：《16 世纪至 19 世纪中越关系史》（Gabriel Devéria,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Annam-Vietnam du XVIe au XIXe siècle d'après des documents chinois traduit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annotés*, Paris, 1880）。

⑤ 近代法国曾出现过三种类型的博士学位：1、国家博士（doctorat d'Etat）；2、第三阶段博士（doctorat du 3e cycle）；3、大学博士（doctorat de l'Université）。法国大革命后，博士阶段成为法国高等教育最高及最后阶段，通过答辩者获得国家统一颁发的博士学位。1897 年，受德国影响，法国创建大学博士学位，主要面向外国学生颁发。从 1954 年开始，各学院为加强专业研究，又相继设立第三阶段专业博士学位。三种学位（其中以国家博士学位的获得最为艰难）并行存在的情况一直到 1984 年才有所改变。此后，法国只设单一博士（doctorat）学位。——译者

⑥ 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俄中交流史（1689-1730）》（Gaston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689-1730), Paris, 1912），（可参考江载华、郑永泰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 年）；加斯东·加恩：《1727-1728 年俄国在京商队账簿》（Gaston Cahen, *Le livre des comptes de la caravane russe à Pékin en* 1727-1728, Paris, 1912）；加斯东·加恩：《18 世纪西伯利亚图集》（Gaston Cahen, *Les cartes de la Sibéri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11）。

据，以及政治、法律和商业制度。毕瓯（Édouard Biot, 1803-1850）从1836年开始陆续发表了第一批关于中国人口和货币体系的重要成果。此外，他还出版了一本论著深入探讨中国教育和考试制度；在书中，毕瓯从评论的角度审视了中国式教育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成就及其在思想层面的缺陷。[①]1841年，颇节为补全欧洲现有关于清朝的统计数据，对1812年版《大清会典》（*Recueil des statuts administratifs de l'empire Qing*）第十一卷（户部）——包含赋税体制和收入的说明——进行了考证翻译。[②]传教士罗类思（Louis de Besy）则为相关研究增添了译自1843年《大清缙绅全书》（*Annuaire des fonctionnaires de l'empire Qing*）的信息。[③]1854年，安托万·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在外交官哥士耆带至巴黎的一位中国文人的帮助下，在《亚洲学刊》（*Journal asiatique*）上发表了细致探讨中国行政体制的最新研究成果。自1839年，他还开启了针对学校教育的全新研究。[④]

以上研究都是在法国有限的文字资料基础上完成的，但很快，它们就被在中国进行的研究所替代，外交官汉学家、耶稣会或遣使会传教士所做的实地考察和更为全面的文献搜集是第一步。顾随（De Courcy）于1867年出版了一部资料丰富的大部头书籍。[⑤]1885年，领事欧仁·西蒙（Eugène Simon, 1829-1896）向读者描绘了一幅田园诗般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图景。[⑥]古恒和微席叶分析了宫廷运转和帝王周围的宠臣显贵，德韦里亚探讨的则是皇帝的婚礼仪式和接见礼仪。[⑦]除此之外，还有些研究分别关注律法和军事。[⑧]对中国研究最多也最深入的是中法耶稣会士，他们的成果都发表在上海的“汉学文集”（*Variétés sinologiques*）以及法语报纸《中法新汇报》（Écho *de Chine*）“东方系列（论丛）”（*Série d'Orient*）。这些研究涉及财产法、家庭法、政治与行政组织形式、盐政、科举制度和宗教活动。传教士们对戊戌变法诏书等当代重要的政治文本进行翻译和解析，还编写了一些大省会和省份的学术方志。1893-1911年间，“汉学文集”共有34期出版。[⑨]遣使会传教士樊国梁（Alphonse Favier）于1897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北京历史的巨著，包含许多清朝的图片和文献。[⑩]在外方传教会中，档案管理者、神父陆南（Adrien Launay）在巴

---

① 毕瓯：《公元前2400年至今中国人口及其变动研究》（Édouard Biot, “Mémoire sur la population de la Chine et ses variations depuis l'an 2400 avant J.-C.”, *Journal asiatique*, 1836, série 3, tome 1, pp. 369-394, 448-474；tome 2, pp. 74-78）。毕瓯：《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清查及其被用于估算中国总人口的做法研究》（Édouard Biot, “Mémoire sur les recensements des terres consignés dans l'histoire chinoise et l'usage qu'on en peut faire pour évaluer la population totale de la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1838, série 3, tome 5, p. 305-331）。毕瓯：《中国货币体系研究》（Édouard Biot, “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monétaire des Chinois”, *Journal asiatique*, 1837, série 3, tome 3, pp. 422-464; tome 4, pp. 97-141, 209-252, 441-467）。毕瓯：《论中国公共教育及文人行会史》（Édouard Biot,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 et de la corporation des lettrés*, Paris, 1845-1847, 2 volumes）。

② 颇节：《中华帝国官方统计文献集》（Guillaume Pauthier, *Documents statistiques officiels de l'empire de la Chine*, Paris, 1841）。

③ 罗类思：《一本1843年缙绅全书中关于中国的统计数据》（Louis de Besy, “Statistiques de la Chine, d'après l'un des Livres rouges de 1843”, *Annales de la Propagande*, 1845, tome 16, n° 2, pp.437-442）。

④ 安托万·巴赞：《中国城镇行政体制研究》（Antoine Bazin, “Recherches sur les institutions administratives et municipales de la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5e série,t.3, 1854, pp.1-66 ; t.4, 1854, pp. 249-348, 445-481）；安托万·巴赞：《论中国学校的内部组织》（Antoine Bazin, “Mémoire sur l'organisation intérieure des écoles chinoises”, *Journal asiatique*, janvier 1839, pp. 32-80）。

⑤ 顾随：《中华帝国》（Marie-René Roussel de Courcy, *L'Empire du milieu*, Paris, 1867）。

⑥ 欧仁·西蒙：《中国城邦》（Eugène Simon, *La Cité chinoise*, Paris, 1885）。

⑦ 古恒：《北京王宫：宫廷的组成、生活及其运转纪略》（Maurice Courant, *La cour de Péking*. *Notes sur la constitution, la vie et le fonctionnement de cette cour*, Paris, 1891）；德韦里亚：《中国皇室婚礼》（Gabriel Devéria, *Un mariage impérial chinois*, Paris, 1887）。

⑧ 师克勤：《中国的父权》（F. Scherzer, *La puissance paternelle en Chine*, Paris, 1878）。有关医学的律法，参见恩斯特·马丁：《〈洗冤录〉主要章节简介》（Dr Ernest Martin, “Exposé des principaux passages du *Si-yuen-lu*”, *Revue de l'Extrême-Orient*, 1882, n° 3, pp. 333-380; n° 4, pp. 596-625）。与军事有关的研究，参见一位驻北京武官的著作，乔治·布里索-德斯玛耶：《1910年3月1日中国军队的状况》（Georges Brissaud-Desmaillet, *Situation de l'armée chinoise au 1er mars* 1910, Pékin, 1897）。

⑨ “汉学文集”的完整目录，参见 https://www.univie.ac.at/Geschichte/China-Bibliographie/blog/2012/04/15/varietes-sinologiques/, 2020年2月12日。网络上可以找到这些文章的电子版本，http://biblioweb.hypotheses.org/7085，2017年8月25日。

⑩ 樊国梁：《北京：历史和记述》（Alphonse Favier, *Pe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Pékin, 1897）。

黎完成的历史研究是独一无二的。这位作者以巴黎的档案和他在罗马与中国一年（1898 年）游历期间收集的文献为基础，撰写并出版了众多内容丰富的杰出著作，讲述外方传教会在华传教工作，尤其是区域传教史和传教士传记。①

8. 对清代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翻译和研究

从 1832 年雷慕沙去世到清朝覆灭，法国学者对清代纯文学作品的关注极少。只有儒莲和莱昂・德・罗斯尼翻译出版过一些小说故事。② 巴黎的图书馆藏有许多其他的清朝文学作品，但这两位学者主要选择的是被称为“才子书”的著作，他们认为此类作品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人的文学偏好。③ 不过，与前人更关注风俗习惯稍有不同，他们在评注翻译作品的同时，还注意从纯文学和美学层面分析其叙事艺术和写作风格。也因此，这些译作才能在法国文学界引发重要反响。此外，儒莲在法兰西公学院的继任者德里文（D’Hervey de Saint-Denys）和中国驻巴黎公使馆随员陈季同翻译的《聊斋志异》选段也大获成功。

法国领事、翻译于雅乐发表了关于袁枚的全新研究，并附对袁枚所作诗歌的精美翻译。他还编著了一本诗集来介绍和赏评最新的诗歌。在书中，作者不仅解释了诗歌的风格，翻译了曾国藩的诗词，甚至还翻译了一首反对法国侵犯东京的挽歌译作。④ 以德韦里亚为代表的其他外交官译员，也通过论著和在重要文化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描述了他们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满怀热情不懈观察到的戏院生活，以及文学、音乐作品的创作情形。⑤ 这些报道受到巴黎文学和艺术界的欣赏和追捧，引发了新的创作潮流。

---

① 陆南：《中国传教史：广西传教》（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Kouang-Si*, Paris, 1903）；陆南：《西藏传教史》（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Thibet*, Paris, 1902, 2 volumes）；陆南：《满洲传教事业》（Adrien Launay, *La Mission de Mandchourie*, Paris, 1905）；陆南：《中国传教史：贵州传教》（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Kouy-Tcheou*, Paris, 1907-1908, 3 volumes）；陆南：《李安德日记：中国神父、传教士和教廷公证人（1746-1763）》（Adrien Launay, *Journal d’André Ly, prêtre chinois, missionnaire et notaire apostolique,* 1746-1763, Paris, 1906）。之后我们还会谈到这部重要书稿的出版。

② 尤其是儒莲 1845 年在巴黎翻译出版的两卷本《平山冷燕》（Stanislas Julien, *Les deux jeunes filles lettrées*，Paris, 1845. 1860 年修订版出版）和 1864 年出版的《玉娇梨》（Stanislas Julien, *Les deux cousines*, Paris, 1864）。莱昂・德・罗斯尼的翻译，参见莱昂・德・罗斯尼：《花笺“情书”，广东近代第八才子诗法文选段》（Léon de Rosny, “*Fa-tsien* ‘les Billets doux’, poème cantonais du VIIIe des *Tsaï-tsze* modernes. Fragments traduits en français”, *Annuaire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japonaises*, 1877, pp. 173-182）。

③ 例如，巴黎皇家图书馆保存的《平山冷燕》被命名为《四才子：平山冷燕》。“才子书”之名源于学者金圣叹（1608-1661）及友人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拣选出版的一套丛书，包含从元到清十部小说。这套丛书于 1644 年首次出版，之后以《十大才子书》为名多次修订再版。古恒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汉语文学作品进行了编目。从他的整理中可以看出，自查理十世和路易 - 菲利普统治时期（1824-1848）起，清代大量风格多样的作品，甚至是刚刚出现的著作（如 1832 年出版的《镜花缘》)，都会被收入国家图书馆。不过它们并没有引起巴黎汉学家的注意，对这些人而言，更早期时代的著名作品才应该受到关注。古恒：《中日韩等国图书目录》（第一卷）（Maurice Courant,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 etc*., *tome 1*, Paris, 1902; 1910）。

④ 于雅乐《18 世纪中国诗人袁子才，他的生平及作品》（Camille Imbault-Huart, “Un poète chinois du XVIIIe siècle, Yuan Tseu-ts’aï, sa vie et ses œuvres”,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for the year* 1884, New Series, Vol. XIX, Part II, Shanghai, 1886, pp. 1-42）。于雅乐《14 至 19 世纪中国诗歌》（Camille Imbault-Huart, *La poésie chinoise du XIVe au XIXe siècle*, Paris, 1886）。

⑤ 关于这个主题，参见 T. 朱茨（即德韦里亚）：《北京和中国北方》（T. Choutzé (Gabriel Devéria), “Pékin et le Nord de la Chine”, *Le Tour du monde*, 1876, tome 31, pp. 305-368; et tome 32, pp. 193-256）。他的妻子，作曲家昂布瓦兹・托马斯（Ambroise Thomas）的侄女，也发表了一篇极出色的论文探讨音乐问题，参见夏洛特 - 德韦里亚 - 托马斯：《中国音乐新论》（Charlotte-Devéria-Thomas, “Essai nouveau sur la musique chez les Chinois”, *Le Magasin Pittoresqu*e, 2ème série, tome3, Août-Décembre 1885, pp. 234-238, 287-288, 327-328, 390-392）。还应注意的是，不久之后，德彪西（Debussy）和拉维尔（Ravel）的朋友，音乐学家、汉学家路易・拉罗依（Louis Laloy）也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音乐的论著，即《中国音乐》（Louis Laloy, *La musique chinoise*, Paris, 1903）。这本著作的价值在于，它通过很多插图展示了中国音乐体系，它的源起、各种乐器、记谱方式及音乐的不同类别，如宗教音乐、室内乐、通俗音乐和戏剧音乐。

从 18 世纪开始，巴黎和法国各大城市的收藏家、业余爱好者及艺术品商人就一直对中国艺术品抱持热情。他们甚至已经可以在重要的销售目录里为这些艺术品提供鉴定。[①]1856 年，一心希望普及物质文明有用知识的儒莲将 1815 年版的《景德镇陶录》翻译为法文，以《中国瓷器制造及历史》（*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为名出版。[②] 这本译著对 1843-1846 年拉萼尼（Lagrené）陪同出访中国的科学贸易考察团所作的细致的中国艺术科技报告是一个重要的补充。[③]

1861 年 3 月，法国军队从圆明园劫掠并呈献给拿破仑三世及皇后的 300 件中国艺术品在杜伊勒里宫（Palais des Tuileries）公开展览。汉学家颇节悲叹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尤其为那里的图书馆被烧毁感到惋惜。在他看来，这些收藏的唯一价值就是展示了当代中国艺术品"令人惊叹"的技艺，且让国人看到了迄今为止流传到欧洲的最大规模的中国艺术作品展。但同时，他也指出，根据这些艺术品的铭文或它们的汉语标记来看，这些都是 18 世纪的作品，甚至有些制成不过 20 年，因此品质不高，从中"远不能完全了解中国艺术"。而成群的观展者在欣赏这些艺术品时也是"好奇大过赞叹钦佩"。[④] 颇节做这样的判断所依据的，是他自己存有以及委托格罗男爵（baron Gros）的翻译从北京买到的有关艺术的汉语书籍。[⑤] 这些新资料使得他能在之后发表相关研究，准确勾勒出下至清朝的中国艺术沿革史。[⑥]

与颇节一样，那时的很多收藏家都希望能够收集到代表真正中国艺术的物品。其先锋是探险家欧内斯特・格朗迪迪耶（Ernest Grandidier,1833-1912）。1870 年，他在亚洲游历时迷上了中国的制瓷术。在艺术品商人和专家的帮助下，他将一生及所有财产都用在了此类收藏上。但充斥着欧洲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出口"瓷器（专门为外国市场制作）很快就已不再是他购买的目标。他的甄选过程采纳了中国行家遵循的普遍标准。在挑选时，他会首先寻找在材料纯度、形制完善程度、图样活力、色彩强度或一些微妙的差别方面符合这些标准的器物。因而，他的 6000 多件艺术品展示了中国，尤其是清代中国制瓷术的水平，构成了欧洲独一无二的收藏。1894 年，格朗迪迪耶把他的收藏献给国家。它们在卢浮宫的水边画廊形成了新的远东艺术展区。[⑦] 成为展区主管的格朗迪迪耶继续以个人购买和接受朋友捐赠的方式丰富着展区的藏品。以这些个人藏品为基础，他出版的《中国制瓷术》（*La céramique chinoise*）更新了外国人在这个

① 参见 1860 年 5 月 1 日《美术报》的一份报告（*La Gazette des beaux-arts*, 1er mai 1860, p. 177）。报告讲述了一些品质特别精良的中国艺术品由于罕见的目录说明不足，导致在拍卖中低价卖出的情况。

② 这本书在路易 - 菲利普统治时期（1830-1848）由皇家图书馆收录。参见古恒：《中日韩等国图书目录》（第二卷）（Maurice Courant,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 etc*. *Tome* 2, Paris, 1910, p. 176, n° 5568）。

③ 这份数千页的笔记报告包含大量图纸、插图和照片（第一代银版摄影照片），由伊西多尔・埃德（Isidore Hedde）、儒勒・伊缇耶（Jules Itier）、娜塔莉・隆多（Natalis Rondot）和奥古斯特・欧斯曼（Auguste Haussmann）执笔，以书籍、文章和大型展览——展览在圣 - 艾蒂安（Saint-Etienne）和里昂举行，主要展出的是此次考察的成果和考察中收集的物品——目录的形式出版。比如 1849 年出版的《中国出口贸易实践研究》（Étude *pratique du commerce d'exportation de la Chine*, Paris, 1849）就详细介绍了中国装饰艺术品的工艺流程。此次考察发表的著作一览表，参见高第：《中国书目》（H.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colonnes 2489-2493）。

④ 颇节：《杜伊勒里宫展出的中国奇珍》（G. Pauthier, "Des curiosités chinoises exposées aux Tuileries", *Gazette des beaux-arts*, 15 mars 1861, pp. 363-369）。这 300 件艺术品随后被移入枫丹白露宫，放置在欧仁尼皇后 1863 年 6 月设立的沙龙博物馆中，不过公众仍可以欣赏。

⑤ 颇节：《杜伊勒里宫展出的中国奇珍》（G. Pauthier, "Des curiosités chinoises exposées aux Tuileries", *Gazette des beaux-arts*, 1861, p. 365）。颇节曾自述只收到了他询问的在欧洲找不到的五本重要著作中的两本，北京的书商用三本涉及其他主题的书籍代替了他要的书。在他要求下买到的两本书，一本是 1708 年出版的六十四卷书法和绘画史，另一本是 1825 年版三十二卷的中国画家传记缩略本。

⑥ 尤其是颇节：《中国文明及其古代历史研究，以当地文字记录和遗迹为基础》（G. Pauthier, *Mémoires sur l'antiquité de l'histoire et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s d'après les* écrivains *et les monuments indigènes*, Paris, 1868）。

⑦ 1945 年，这些藏品被移入集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当时是隶属于国家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馆），直至今天。

问题上的认识，开创了一种能够被西方艺术专家和艺术史家使用的真正的科学方法。① 卢浮宫还保存着伯希和与沙畹到中国考察（1900、1907、1908 年）带回的包括七幅清代画卷在内的绘画作品及一些小雕像。这些画作 1904 年在一次特别展览中展出，反响极大。②1907 年，卢浮宫艺术品部（由米戎创立的远东艺术品展区就由这个部门管辖）主管加斯通·米戎（Gaston Migeon, 1861-1930）在他任教的卢浮宫学院（l’Ecole du Louvre）开始了中国艺术教育。

1876 年，里昂痴迷艺术的工业家埃米尔·集美（Emile Guimet, 1836-1918）与画家菲利克斯·雷加梅（Félix Régamey）一起进行了一场为期两年的环球旅行。不过他在中国只停留了几个星期，而且带回的多是日本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收藏在集美于 1879 年在里昂建立的以宗教艺术为主题的博物馆里。1884 年，由于不受关注，失望的他将这些藏品交给了国家。它们被安置于集美自费在巴黎建造的新博物馆里，1889 年开始对外开放。这座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图书馆，1880 年，集美还为它创立了一份远东艺术专门杂志，《集美博物馆年鉴》（*Les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1896 年，银行家亨利·塞努奇（Henri Cernuschi）去世，他把自己的府邸和异常丰富的远东艺术收藏——包括他自 1871 年第一次在中国游历以来收集到的大量中国绘画作品——都赠给了巴黎市，由此形成了塞努奇东方艺术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 des arts de l’Asie）。

收藏家们不再只是将手中代表中国艺术的藏品和信息留给学术圈，而是与社会大众分享它们。这一创举大获成功，并激发了一些新的文学艺术潮流及实践，比如那比派（les Nabis）。1887 年，驻北京的年轻外交官莫里斯·帕雷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在他的同事、翻译官德韦里亚和微席叶的帮助下出版了一本解释中国艺术美学理论和现存形式的综合性书籍。这本书写得极好，图文并茂，读者众多。③ 从 1885 年起，由于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殖民征服，中国文化在法国人的想象中也就显得更为亲近，也更有意思。于是佩初兹（Raphael Petrucci）在世纪之交出版的关于中国绘画和审美观的书籍——在书中，作者拒绝以所谓衰落的名义贬低清朝的绘画——受到了热烈追捧。④ 在他翻译的《芥子园画传》里，这位作者甚至直言，这幅画作所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和技术水平丝毫不逊于欧洲最好的绘画作品。⑤

9. 对时事的评论与探究

1835 年到 1911 年间关于清帝国的大部分法语出版物都不属于学术研究，而是时事调查和评论讯息的报告。⑥ 它们均是法国人对他们所见或亲身参与的大事件的见证和记述。由是，鸦片战争、拉萼尼使团和他之前的法国海军使团、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教案、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起义、日俄战争等所有这些事件，特别是 1899 年至 1901 年间发生的事情，吸引目击者发表了许多论著和文章。这些通常比较完整的法语作品文献价值丰富，有时甚至超过其他外国文献和中文记录。⑦ 一些在中国居住或是单纯游历的法国人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回忆录，但信息量通常不大且互相抄袭严重，不过其中也不乏一些准确而有价值的观

---

① 欧内斯特·格朗迪迪耶：《中国制瓷术》（Ernest Grandidier, *La céramique chinoise*, Paris, 1894）。书中包含四十二幅插图。

② 沙畹：《卢浮宫的中国绘画》（Édouard Chavannes, “La peinture chinoise au Musée du Louvre”, *T’oung-pao*, 1904, volume 5, n° 3, pp. 310-331）。

③ 莫里斯·帕雷奥洛格：《中国艺术》（Maurice Paléologue, *L’art chinois*, Paris, 1887）。作者 1885 年至 1886 年在北京任职。

④ 佩初兹：《远东艺术中的自然哲学：以 8 世纪至 18 世纪风景名家的原作为例》（Raphaël Petrucci, *La philosophie de la nature dans l’art d’Extrême-Orient: illustré d’après les originaux des maîtres du paysage des VIII au XVIIIe*, Paris, 1910）；佩初兹：《中国画家评议》（Raphaël Petrucci, *Les peintres chinois,* étude *critique*, Paris, 1912）。沙畹、佩初兹：《塞努奇博物馆的中国绘画》（Édouard Chavannes, Raphaël Petrucci, *La Peinture chinoise au musée Cernuschi*, Bruxelles, 1914）。

⑤ 佩初兹：《如芥子般大小花园的绘画技法：〈芥子园画传〉，中国绘画百科全书》（Raphaël Petrucci, *“Kiai-tseu-yuan houa tchouan”, les enseignements de la peinture du jardin grand comme un grain de moutarde, Encyclopédie de la peinture chinoise*, Paris, 1912）。

⑥ 1912 年之前在法国答辩的博士论文中只有两篇是关于清朝的。

⑦ 这些作品都被完整编目收集在高第的《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中。

察。[1] 义和团起义之后，许多人真正开始在中国游历。为此，克罗迪于斯·马德罗勒（Claudius Madrolle）从1904年开始出版了两本旅游指南：《中国北方》（*Chine du Nord*）和《中国南方》（*Chine du Sud*）。它们是关于清帝国的小百科全书，书中还附有中国最好的研究者沙畹、古恒或微席叶对中国地理、历史、考古及社会所做的简要介绍。

自1895年开始，尤其是1900年以后，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与国际形势相关联的对中国时事的常规调查、分析和评论——愈加普遍。包括沙畹、伯希和在内的新一代汉学家和法国远东学院的带薪学者，以及研究东亚的记者和政论家，都在实践这类写作。他们中的一些会定期从巴黎来到中国，如让·罗德（Jean Rodes）；另一些，如费尔南·法尔热内尔（Fernand Farjenel）只是偶尔才来，却与在巴黎的中国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有一些则索性在研究地长居，如埃德蒙·罗达什（Edmond Rottach）在中国，[2] 查理·迈邦（Charles Maybon）在印度支那，查理·迈邦的兄弟阿尔贝·迈邦（Albert Maybon）在日本。[3] 他们与立场各异的中国报界和政界人士关系紧密，而他们的文章也会定期出现在各类出版物上，如巴黎和法国各省的主要报纸，以《蓝皮杂志》（*Revue Bleue*）为典型的信息类期刊，《法属亚洲委员会通报》（*Bulletin du 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之类东亚专业领域的期刊，以及查理·迈邦在1907-1925年主持的《印度支那杂志》（*Revue indochinoise*）或《中法友好协会通报》（*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amicale franco-chinoise*）等。不仅如此，这些刊物还会刊登中国最新的重要政治文本的法语翻译。[4]

三、1912–1949年：对文化和地方社会发展演变的研究

1. 变化不大的研究体制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一直到1949年，法国中国研究的体制设置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20年4月13日，在叶恭绰的倡议下，巴黎大学设立汉学研究所，中国政府为其提供资助并捐赠了一些书籍。[5] 葛兰言定期在这里授课，并为此邀请多位讲座学者。汉学研究就这样进入了索

---

① 这些作品中的许多——或整本或摘录——都发表在颇受欢迎的插画周刊《环游世界之旅行新刊》（*Le Tour du monde, nouveau journal des voyages*, Paris, 1860-1914）上。

② 他的论著《近代中国》（Edmond Rottach, *La Chine moderne*, Paris, 1911）凭借其在两湖大学堂（Université du Lianghu）的教学经验，描述了自1900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事件和政治潮流。

③ 阿尔贝·迈邦撰写了两本信息量极大的著作，分别是《中国的政治：中国政党学说研究，1888-1908》（Albert Maybon, *La politique chinoise:* étude *sur les doctrines des partis en Chine,* 1888-1908, Paris, 1908）和《中国宫廷秘史》（Albert Maybon, *La Vie secrète de la cour de Chine*, Paris, 1910）。

④ 上海的耶稣会士管宜穆（Jérôme Tobar）从1898年就开始将张之洞的《劝学篇》和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的相关文本翻译成法语，在法国被各种杂志转载。《中法新汇报》和其他中国法语报纸上也刊登了大量立宪改革的文本翻译，被法国出版物和杂志争相引用。河内巴维学校教授皮埃尔·奥古（Pierre Aucourt）翻译了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的文章（1907年1月《民报》的创刊纪念日文章和《革命方略》），发表在1907年的《法国远东学院通报》（*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tome 7, n° 3-4, juillet-décembre 1907, pp. 449-453）上。1908年，迈邦在自己的书中（上个注释提到过）对这些翻译进行修正，并补充翻译了其他文本。1911年10月，《革命方略》重新在一些杂志上发表。新文学著作，比如陈天华的作品也被翻译登载在《中法友好协会通报》上。《中法友好协会通报》和《通报》的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专栏特别详细地介绍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事件，且附有大量各种文献的翻译。

⑤ 1919年夏在巴黎停留期间，叶恭绰作为中国政府派驻巴黎和会讨论工业与金融问题的工业考察团团长，向保罗·潘勒韦（Paul Painlevé）建议在巴黎——或是法兰西学院（Institut de France），或是法兰西公学院，或是巴黎大学——建立一个旨在向欧洲人传授中国文学、历史和文化的学院，中国政府将每年为其提供20000法郎的资助。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索邦大学刚刚设立了日本学讲席教授的职位，叶恭绰如此建议的目的就是为了与之抗衡。尽管伯希和和他的汉学家同事们极力反对，认为学术绝不应该受中国政治干预影响，但潘勒韦却在他的科学家同事的支持下，于1920年3月24日成功使这一提议在巴黎大学委员会投票通过。关于汉学研究所的建立及其开创时期，参见玛丽安娜·巴斯蒂-布吕吉埃：《民国在对外文化政策上的早期尝试》，刘东主编：《"中国学术"十年精选：融合与突破》，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03-

邦大学，不过相关大学学位却还没有出现。而且此时的课程、讲座和出版物的关注点都在古代中国或是中华民国，几乎不涉及清代。1928-1948 年，汉学研究所的八名中国学生在爱德华·梅斯特——这位学者原是越南牢该省（Lao-Kay）的海关稽查，后成为研究该地区山区民众的杰出社会学家——的帮助下，完成了他们关于清代中国的论文。其中的两篇研究法律，一篇以 1842-1911 年清朝海关为主题，一篇讨论《儒林外史》，剩余的则分别研究新疆的开发、1881-1924 年的中俄关系、清朝对蒙古和西藏的政策以及直到 1842 年中国在对西方关系问题上的思索与实践。不过，汉学研究所最重要的贡献是搜集了极为丰富的汉语著作，尤其是各种丛书、方志、奏议、文集、文存、传记、纪略、笔记和年谱，还有伯希和在北京为图书馆买回的各类刊物及工具书，这些都为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的清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文献与历史科学分部也在进行汉学研究。雅克·巴科从 1919 开始在这里讲授藏语文本，1936 年成为藏语文献讲席教授。1927 年，伯希和在法兰西公学院讲席之外还兼任这里的汉语文献教授，但并没有课程安排，只是担任学术委员会成员。1945 年伯希和去世，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接替他成为“佛学文献”教授，开设清代之前的研究课程。培养博物馆负责人的卢浮宫学院 1907 年设置远东艺术课程，1955 年设立远东艺术史讲席。1936 年，中法汉学研究所（中文全称为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在北京（时称北平）成立，吸引了一些法国年轻汉学家来此学习，直到 1953 年被中国政府下令关闭。[①] 研究所刊物《法国研究》（*Etudes françaises*）自 1939 年 11 月在北京发行，直到 1943 年 11 月停刊，几乎从未登载过关于清朝的文章。1942 年，研究所组织了第一届中国民俗肖像绘画展览，其中的许多仪式画像都是清朝作品；然而无论是展览的规划还是发布的目录，都是从宗教人类学和民族学——而非历史或历史人类学——维度出发设计的。[②] 除了所长安德烈·铎尔孟（André d’Hormon）从事的《红楼梦》翻译工作外，中法汉学研究所的活动都与清朝无关。但是在研究所关闭后，其图书馆藏的大量汉语著作和刊物——其中的很大部分都体现了清朝的渊博学术——都被运回巴黎，极大地丰富了汉学研究所的收藏。

被誉为“帝国明珠”的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在法国的中国研究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些探讨过去三个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要杰出研究者均出自这个地区或是移居中国的法国人。他们中有军官、海员、传教士、外交人士、行政人员、法官、记者以及中国政府雇佣的专家学者，这些人要么居住在中国，要么经常到中国来。在中国和印度支那，他们著作的读者多是外国人。而在法国，则主要是需要处理中法关系的行政人员、政界和商界人士、上层社会和有学问的人士。在某些情况下，普通民众也会关注这些书籍，但极少有学院派汉学家对其留意。

2. 辛亥革命后对帝国崩溃的反思

1912 年清朝覆灭使得学者们重新审视清朝末年的历史，以此来分析革命运动的形成、革命的迅速胜利、革命者对这个国家未来的规划以及他们成功的可能性。记者让·罗德不仅对他十余年间来往密切并多次访问的重要人物有着精辟的见解，还详细描绘了他在中国多地游历时所见所闻中的民众对革命的各种反应。[③] 让读者看到了清王朝在最后十年进行改革的真实深度，以及

---

416 页。葛夫平在其研究中讲述了这一机构之后的历史，参见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 1912-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年，第 217-269 页；葛夫平、魏丕信：《伯希和与汉学研究所》（Ge Fuping et P.- E. Will, “Paul Pelliot et l’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in Jean-Pierre Drège et Michel Zink (éds.), *Paul Pelliot: de l’histoire à la légende*, Paris, 2013, pp. 261-301）。

① 关于这个研究所，参见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 1912-1949》，第 269-295 页。但作者所给出的研究所的创始时间是错误的，真正的时间应该是 1936 年而非 1939 年。

② 中法汉学研究所：《民俗肖像绘画展览：新年仪式年画》（Centre franco-chinois d’études sinologiques, *Exposition d’iconographie populaire: images rituelles du nouvel an*, Pékin, 1942）。

③ 让·罗德：《中国与 1910-1911 年立宪运动》（Jean Rodes, *La Chine et le mouvement constitutionnel (1910-1911)*, Paris, 1913）；

当时被称为“少年中国”（la“Jeune Chine”）运动的活力。他以同情的态度将这场运动描绘为反满的民族主义运动，指出革命者渴望的是以日本为榜样在各个领域实现现代化。不过，这场运动的成员差别很大，既有新式学校培养的学生和青年军官，也有关注在华外国人活动和外部世界演变的旧式学者和文武官员。致力于前沿社会学科理论和实践的自由社会科学学院（Collège libre des sciences sociales）教授法尔热内尔能够读讲汉语，他在发表或出版的文章论著中讨论的是当时中国的社会和道德。① 从 1911 年 9 月到 1912 年 12 月，他应一些议员的要求进行了一次学术之旅，从云南历经上海、武汉，最后到达北京。回到法国后，法尔热内尔出版的专著不仅对中国过去 20 年的政治演变进行了概述，而且凭借他的实地考察、与中国众多政治领袖（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袁世凯）及各界知名人士的访谈所获得的丰富信息和一手材料，分析了这一共和体制的基础和开端。② 这本书要比阿尔贝・迈邦处理同一主题的论著出色很多，③ 后者直到皇帝退位后的 1912 年 3 月才来到中国。实际上，法尔热内尔以许多具体准确的细节讲述了中国各个省区各领域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行为表现和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他还清醒客观地揭示了各国使团和给中国贷款的四国银行国际金融财团所施加的压力导致新成立的中国议会体制几乎马上崩溃及其向军事独裁迈进的过程。而这一点，迈邦则完全没有提及。不仅如此，法尔热内尔坚持认为是新的崇高的信念激励着革命者，并在广大民众中得到了广泛的拥护，而在迈邦看来，摧毁这个帝国的不是共和思想，而是各种特殊利益因情势所需结成的联盟。与迈邦相似，罗达什在他的著作中描述的是一场发生在极少数重要人物之间的权力斗争，普通民众并没有参与其中，他们或冷漠以对，或只是趁着公共秩序的混乱松弛烧杀劫掠。④ 他强调外国，尤其是法国外交和金融势力应为中国由于帝制垮台而引发的政权软弱无力负责，但中国革命在他眼中仍只是“一场可鄙的革命，缺乏激情且并不高尚”。⑤ 在他看来，“新萌芽”存在于南方知名人士和富裕商人领导的以经济为基础的地方政治运动中，然而“活力不足”。⑥ 年轻的藏学家雅克・巴科对准备摆脱中国控制的藏人的精神状态给出了有创见性的分析，并讲述了 1908 年陪他到巴黎且在两年后与他一起回到西藏的一位受过教育的藏人对中国各种事件的反应。此外，1909 年到 1910 年在中国游历期间，他还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对从未得到关注的摩梭族（如今称为纳西族）进行了实地的细致研究，并发表了摩梭族民族志。⑦

1912 年初到 1914 年 8 月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出现了大量探讨清朝覆灭的公开讲座，其内容随后被发表在期刊上。参与讨论的有汉学家和普通学者，有新闻记者，也有政界或商界游历

让・罗德：《中国政治十年：革命前的天朝》（Jean Rodes, *Dix ans de politique chinoise - le Céleste Empire avant la Révolution*, Paris, 1914）；让・罗德：《中国革命生活景象，1911-1914》（Jean Rodes, *Scènes de la vie révolutionnaire en Chine (1911-1914)*, Paris, 1917）；让・罗德：《中国政治十年：满族的终结》（Jean Rodes, *Dix ans de politique chinoise - La fin des Mandchous*, Paris, 1919）。

① 费尔南・法尔热内尔：《中国的伦理道德：远东社会的基石》（Fernand Farjenel, *La morale chinoise: fondement des sociétés d'Extrême-Orient*, Paris, 1906）。

② 费尔南・法尔热内尔：《亲历中国革命》（Fernand Farjenel, À *travers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Paris, 1914）。

③ 阿尔贝・迈邦：《中华民国》（Albert Maybon, *La République chinoise*, Paris, 1914）。

④ 埃德蒙・罗达什：《革命中的中国》（Edmond Rottach, *La Chine en révolution*, Paris, 1914）。这本书汇集了发表在《巴黎杂志》（*La Revue de Paris*）上的文章。罗达什曾在 1912 年短暂访问过北京和广州。

⑤ 埃德蒙・罗达什：《革命中的中国》（Edmond Rottach, *La Chine en révolution*, Paris, 1914, p. 268）。

⑥ 埃德蒙・罗达什：《革命中的中国》（Edmond Rottach, *La Chine en révolution*, Paris, 1914, p. 266）。

⑦ 雅克・巴科：《反抗的西藏：走向西藏人的应许之地乃白玛科，附一位在法藏人的感想》（Jacques Bacot, *Le Tibet révolté. Vers Népémakö, la Terre promise des Tibétains, suivi des impressions d'un Tibétain en France*, Paris, 1912）。雅克・巴科：《摩梭人：摩梭人种、信仰、语言和文字研究》（Jacques Bacot, *Les Mo-So: ethnographie des Mo-so, leurs religions, leur langue et leur écriture*, Leiden, 1913）。这部著作使用了许多从未被使用的重要文献，其中沙畹翻译的摩梭国王传记谱系的汉语手稿是国王后人（即当时的土司）在丽江交给巴科的。

者。他们观点各异，有些人强调辛亥革命带来了日益严重的混乱无序，另一些人则对新的社会力量摆脱束缚、日益显现信心十足。①

3. 在法中国学生的学业论文对法国清史研究的新贡献

在涉及清朝的法语出版物中，还应加入逐渐增多的以法语写作的中国学生的博士论文。在这其中，有些人关注的只是中国的内政，② 但那些选定主题的中心议题则是帝国主义和外国在中国的利益问题。③ 这些中国年轻人以法语写作并在法国或是上海（如果研究是在震旦大学进行的话）发表的学术成果，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都是法国体制框架内清朝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④ 不过这些论文所体现的学术水平却并不均衡，其中的大多数都出自大学博士之手（而相比之下，国家博士的要求要更严格些）。但也有一些中国学生的论文使用了从未用过的文献且提出了新颖的解释，如李雄飞关于督察院研究，萧金芳关于开明专制，陈宗蓥和何昌炽关于新疆，以及魏英邦关于蒙古和西藏的论文。⑤ 此外，有学生描述新闻业的发展等新的文化现象，⑥ 也有人根据最新的人种学方法进行少数民族研究。⑦ 还有几篇论文讨论的是法国人对清朝的看法。⑧ 而在文学方面，王琡瑛关于纳兰性德、贺师俊关于《儒林外史》、郭麟阁和李辰冬研究《红楼梦》的论文是以法语进行清代小说和诗歌名著研究的第一批成果。⑨ 陈绵探讨的则是清朝戏剧并给出

---

① 高第：《中国书目》（H.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pp. 3489-3501, pp. 4183-4192）。高第编目了其中的一部分。

② 例如未来的驻比利时大使钱泰（1888-1962）的论文。见钱泰：《中国的立法权》（Tsien T'ai, *Le pouvoir législatif en Chine*, Paris, 1914）。

③ 朱鹤翔（后来同样成为了驻比利时大使）：《领事裁判权制度与中国的立宪改革》（Louis Ngaosiang Tchou, *Le régime des capitulations et la réforme constitutionnelle en Chine*, Cambridge, 1915）；陈继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Tchen Ki Chan, *La politique de la porte ouverte en Chine*, Paris, 1912）；胡世泽：《近代中俄关系的条约依据》（Hoo Chi-tsai, *Les bases conventionnelles des relations modernes entre la Chine et la Russie*, Paris, 1918）；陈和铣：《1871 年至今的中日外交关系》（Hoshien Tchen, *Les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entre la Chine et le Japon de* 1871 *à nos jours*, Paris, 1921）；侯文平：《论中国的内债》（Hou Wen Ping, *Essai sur les emprunts intérieurs de la Chine*, Shanghai, 1920）。此后，许多中国学生的博士论文都开始关注治外法权和海关制度。

④ 从 1912 年到 1949 年，在法国答辩的关于清朝的博士论文中，有 101 篇是中国学生的研究，只有 6 篇是法国人或是其他国家学生的论文。参见格扎维埃·纪尧姆：《1884-1977 年在法答辩的关于亚洲的博士论文》（Xavier Guillaume, *Thèses sur l'Asie soutenues en France,* 1884-1977, Paris, 1978）所编制的目录。在这个问题上，还可参见伦纳德·高登（又译作高理宁）、弗兰克·舒尔曼（又译作苏文）：《关于中国的博士论文，1945-1970》（Leonard Gordon & Frank Shulman,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China,* 1945-1970, Seattle/Londres, 1972），但这本书编目不全。

⑤ 李雄飞：《满王朝的御史，1616-1911》（Li Hsiung-fei, *Les censeurs sous la dynastie mandchoue (1616-1911)*, Paris, 1936）；萧金芳：《启发开明专制思潮的中国》（Siao King-fang, *La Chine inspiratrice du despotisme* éclairé, Paris, 1939）；陈宗蓥：《清朝新疆省开垦史》（Chen Tsu Yuen, *Histoire du défrichement de la province du Sin-Kiang sous la dynastie Ts'ing*, Paris, 1932）；何昌炽：《中国在中国突厥斯坦的殖民事业》（D. Ho, *L'œuvre colonisatrice de la Chine dans le Turkestan chinois*, Paris, 1941）；魏英邦：《1871-1922 年中国的蒙古和西藏政策》（Wei Ying Pang, *La politique chinoise en Mongolie et au Tibet de 1871 à 1922*, Paris, 1948）。

⑥ 林素珊：《中国报业史》（Lin Shu-shen, *Histoire du journalisme en Chine*, Avesne-sur-Helpe, 1937）。

⑦ 凌纯声：《中国南方瑶族民族志研究》（Ling Zeng Seng, *Recherches ethnographiques sur les Yao dans la Chine du Sud*, Paris, 1929）。

⑧ 丁肇青：《法国人对中国的描述（1650-1750）》（Ting Tchao-tsing, *Les descriptions de la Chine par les Français (1650-1750)*, Paris, 1928）；陈翔冰：《法国新闻出版与中国问题（1894-1901）：关于外国势力在华竞争对抗的研究》（Chen Changbin, *La presse française et les questions chinoises* (1894-1901), Étude *sur la rivalité des puissances* étrangères *en Chine*, Paris, 1941）；梁锡英：《明末以来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人思想的相遇与冲突》（Liang Si-ing, *La rencontre et le conflit entre les idées des missionnaires chrétiens et les idées des Chinois en Chine depuis la fin de la dynastie des Ming*, Paris, 1940）。

⑨ 王琡瑛：《纳兰性德：1655-1685》（Wang Soo-Ying, *Na-lan Sing-tö, 1655-1685,* Paris, 1937）；贺师俊：《文人小说〈儒林外史〉：中国讽刺小说研究》（S. C. Ho, *Jou Lin wai che*. *Le Roman des Lettrés,* étude *sur un roman satirique chinois*, Paris, 1933）；郭麟阁：《论 18 世纪中国知名小说〈红楼梦〉》（L. K. Kou, *Essai sur le Hong Leou Mong (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 célèbre roman chinois du XVIIIe siècle*, Lyon, 1935）；李辰冬：《论〈红楼梦〉研究》（C. T. Lee, Étude *sur le Songe du*

了一份曲目的分析目录。[①] 此外，郑毓秀和盛成的自传体著作——盛成的著作甚至由著名作家、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作序——在法国知识界真正取得了成功，对法国人理解清朝从君主制走向革命的转变极有助益。[②]

4. 1914 年后在法国进行的研究：政治史的衰退以及文化和制度史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人在法国进行清朝研究的情况十分罕见。法国出版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普及性著作，其中有对清朝的概述，不过其关注点均在清朝的对外关系上。[③]1893-1897 年的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uguste Gérard）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很有意思，因为施阿兰不仅见证了危机期间的清朝宫廷状况，还对此做出了一些评断。[④] 高第将他的文章收入到数册论文合集中，[⑤] 并出版了巨著《中国通史及其从最早直到满族王朝崩溃的对外关系》（*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étrangers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anciens jusqu'à la chute de la dynastie mandchoue*）。[⑥] 这部著作主要是对各个事件的描述，只在少数问题上提供了深入的历史解释，其重要价值在于全文引用了大量常人很难接触到的原始文献。经常到中国旅行的哲学家、共产党员费利西安·沙莱耶（Félicien Challaye）的书籍其实是新闻报道。[⑦] 其他如关于慈禧的论著，则是使用二手材料，且错漏百出的通俗作品。[⑧]1925 年高第去世后，法国唯一真正重要的清史研究是毕诺（Virgile Pinot）关于中国在启蒙思想形成中的作用的国家博士论文。[⑨] 伯希和出版了一本很薄的专著，讨论 18 世纪初第一艘法国商船到达中国的情况。[⑩] 此外，还需提到的是稍晚出版的一些关于 19 世纪法国对中国军事远征的珍贵文献证据，比如蒙托邦将军回忆录。[⑪]

Pavillon rouge, Paris, 1934）（可参阅作者的中文改写本，重庆：正中书局，1942 年）。

① 陈绵：《近代中国戏剧》（Tcheng Mien, *Le théâtre chinois moderne*, Paris, 1929）；陈绵：《中国近代戏目注解》（Tcheng Mien, *Répertoire analytique du théâtre chinois moderne*, Paris, 1929）。

② 郑毓秀：《童年与革命回忆录》（Tcheng Soumay, *Souvenirs d'enfance et de révolution*, Paris, 1921）；盛成：《我的母亲》（Cheng Tcheng, *Ma mère*. Préface de Paul Valéry, Paris, 1928）；1929 年，盛成发表了另一部更长的法语著作《经历了中国革命的我与我的母亲》（Cheng Tcheng, *Ma mère et moi à travers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Paris, 1929）。

③ 乔治·马斯佩罗：《中国》（Georges Maspero, *La Chine*, Paris, 1918）。这本书的增补两卷本于 1925 年出版。马斯佩罗的著作是此类论著中最为出色的。这位作者曾在印度支那担任高级公务员长达二十年，他学习了汉语，且对华人世界极有研究兴趣。埃米尔·奥弗拉克：《远东民族：中国》（Émile Hovelaque, *Les peuples d'Extrême-Orient: la Chine*, Paris, 1920）。奥弗拉克试图表明的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应该与西方国家一样得到同等对待，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软弱使这位作者无法为之描绘出一幅较为美好的图景。此后出版的普及性书籍在清朝问题上愈发简略，不过其写作却多能延续到民国时期，如乔治·迪巴比耶：《近代中国史》（Georges Dubarbier, *Histoire de la Chine moderne*, Paris, 1926）；让·爱斯嘉拉（又译作让·埃斯卡拉）：《中国：过去与现在》（Jean Escarra, *La Chine: passé et présent*, Paris, 1937）。勒内·格鲁塞的著作也很受欢迎，但其追溯的是更早期的时代，参见勒内·格鲁塞：《中国史》（René Grousset, *Histoire de la Chine*, Paris, 1947）。

④ 施阿兰：《1893-1897 年：我在中国的使命》（A. Gérard, *Ma mission en Chine, 1893-1897*, Paris, 1918）。

⑤ 高第：《东方地理与历史杂论》（Henri Cordier, *Mélanges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 orientales*, tome 1, Paris 1914; tome 2, Paris, 1920）。这两册文集囊括了大量关于清朝中法关系和中法交流的文章。

⑥ 这部四卷本著作 1920 年在巴黎出版，其中第三卷起止时间为 1368-1820 年，第四卷则从道光统治时期讲到 1912 年。

⑦ 沙莱耶在其中一本书中以反殖民主义的观点集中地表达了对于清朝覆亡的历史性反思，参见费利西安·沙莱耶：《中国与日本政治现状》（Félicien Challaye, *La Chine et le Japon politiques*, Paris, 1925）。

⑧ 费尔南德·卡巴内尔：《最后一位女帝：中国慈禧皇后的一生（1835-1909）》（Fernande Cabanel, *La dernière impératrice: vie de l'impératrice de Chine Tseu-hi (1835-1909)*, Paris, 1936）。

⑨ 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1640-1740》（Virgile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1640-1740*, Paris, 1932）；毕诺：《1685-1740 年法国对中国认识的未刊文献》（Virgile Pinot, *Documents inédits relatifs à la connaissance de la Chine en France de 1685 à 1740*, Paris, 1932），（可参阅耿昇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0 年）。

⑩ 伯希和：《法国对华交流的开端：安菲特里忒号第一次出航中国》（Paul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en Chine, Paris, 1930）。

⑪ 夏尔·库赞·德·蒙托邦：《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Charles Cousin de Montauban, *L'Expédition de Chine de* 1860; souvenirs du *général Cousin de Montauban, comte de Palikao, publiés par son petit-fils*, Paris, 1932），（可参见王大智、陈娟的

新的研究也在向着传统历史主题之外的其他领域发展。学者们深入研究了科学、法律、宗教和艺术，但对文学的关注较少。1915 年，欧仁・樊尚（Eugène Vincent）医生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医学状况的综合性著作，使用文献极为丰富，内容包括医学实践、治疗、保健和中国的卫生情况。[①] 驻华副领事博代（Baudez）考察了外国人在华司法制度。[②] 马塞尔・特鲁什（Marcel Trouche）在他于巴黎答辩的论文里研究了北京使馆区的历史与司法制度。[③]1928 年，马伯乐（Henri Maspero, 又译作亨利・马斯佩罗）出版了极具创新性的宗教社会学著作《近代中国神话》（*Mythologie de la Chine moderne*），实际涉及的是清朝的民间信仰。[④] 在这本书中，马伯乐考察了那些依然存在的神话，讲述了当时信仰中的诸神，探讨了这些信仰的历史源流、崇拜仪式以及各神庙的地理分布和面貌。

另一些新研究出现在艺术史领域，其中也有对清朝艺术的探讨。这是汉学大家沙畹、伯希和对清朝唯一加以关注的领域，不过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极少，且选择的都是比较不太重要的主题。[⑤] 关于清朝艺术的著作主要研究的是个人或博物馆的艺术品收藏、展览的名录以及针对某些类型艺术品——雕塑、绘画、瓷器、漆器和地毯——的专著，注重的是技术、风格及其象征意义的演变。作者大多是专注于亚洲艺术的塞努奇和集美博物馆的负责人或下属，或是 1945 年成为集美博物馆前的卢浮宫亚洲艺术展区的负责人或下属。[⑥] 那些中国艺术通史的普及读物都在解释中国艺术的独特美学原则及其价值，比如最畅销的摩伦（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 1878-1955, 又译作苏理耶德摩朗）的著作。[⑦] 这位先前的翻译和领事曾身处著名女性文人朱迪特・戈蒂埃（Judith Gautier）的交往圈并由此开始学习汉语，但从其作品来看，摩伦是个多面手。他从法律的角度撰写过关于治外法权的重要综述，也研究过在华耶稣会士的事业。他翻译过古代文学作品；1929 年后还翻译了一些科学著作，得益于这些翻译，中国的针灸术才能在 1932 年被引入到法国常规的医疗和医院实践中。[⑧]

中译本，中西书局，2011 年）。此外还可参见埃利・朱利安：《中国远征回忆录，1900-1902》（Élie Jullian, *Souvenirs de l'expédition de Chine, 1900-1902*, Paris, 1928）。

① 欧仁・樊尚：《20 世纪中国医学》（Eugène Vincent, *La médecine en Chine au XXe siècle*, Paris, 1915）。

② 马塞尔・博代：《外国人在华司法状况》（Marcel Baudez, *La condition juridique des étrangers en Chine*, Paris, 1913）。

③ 马塞尔・特鲁什：《北京使馆区历史与司法研究》（Marcel Trouche, *Le quartier diplomatique de Pékin: étude historique et juridique*, Rodez, 1935）。

④ 这本作品成为保罗 - 路易・古舒（Paul-Louis Couchoud）著作的一个章节，参见保罗 - 路易・古舒：《亚洲神话图示》（Paul-Louis Couchoud, *Mythologie asiatique illustrée*, Paris, 1928, pp. 227-362）。

⑤ 沙畹：《中国民俗艺术中愿望的表达》（Édouard Chavannes, *de l'expression des vœux dans l'art populaire chinois*, Paris, 1922）；伯希和：《欧洲对 17、18 世纪中国艺术的影响》（Paul Pelliot, *Les influences européennes sur l'art chinois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48）。

⑥ 亨利・达登・德・提萨克：《中国艺术中的动物》（Henri d'Ardenne de Tizac, *Les animaux dans l'art chinois*, Paris, 1922）；亨利・达登・德・提萨克：《塞努奇博物馆收藏中的中国装饰艺术》（Henri d'Ardenne de Tizac, *L'art décoratif chinois d'après les collections du Musée Cernuschi*, Paris, 1930）；让 - 约瑟夫・马尔凯・德・瓦瑟洛：《中国瓷器》（Jean-Joseph Marquet de Vasselot, *La céramique chinoise*, Paris, 1922, 2 volumes），其第二卷从康熙统治时期开始讲起；亨利・里维耶：《远东艺术中的瓷器》（Henri Rivière, *La céramique dans l'art d'Extrême-Orient*, Paris, 1923, 2 volumes）；奥迪朗・罗奇：《中国家具》（Odilon Roche, *Les meubles de la Chine,* Paris, 1921）；莫里斯・杜邦：《中国家具》（Maurice Dupont, *Les meubles de la Chine* (*deuxième série*), Paris, 1926）；戴西・利翁 - 戈德施密特：《中国艺术》（Daisy Lion-Goldschmidt, *L'Art chinois*, Paris, 1931）；戴西・利翁 - 戈德施密特：《中国的艺术：青铜器、玉器、雕刻与瓷器》（Daisy Lion-Goldschmidt, *Les arts de la Chine: bronze, jade, sculpture, céramique*, Paris, 1937 (5ème édition refondue, Paris, 1980)）；戴西・利翁 - 戈德施密特：《中国瓷器》（Daisy Lion-Goldschmidt, *Céramique chinoise*, Paris, 1950）；玛德琳・保罗 - 大卫：《中国艺术及其风格》（Madeleine Paul-David, *Arts et styles de la Chine*, Paris, 1953）。

⑦ 摩伦：《古代迄今中国艺术史》（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 *Histoire de l'art chinois de l'antiquité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1928）。

⑧ 摩伦：《治外法权与外国在华利益》（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 *Exterritorialité et intérêts étrangers en Chine*, Paris, 1925）；

第一位对清代文学进行整体概述的学者是汉学家、东方语言学院教授马古礼（Georges Margouliès），他在晚些时候出版了研究中国文学通史的专著。①

5. 1912−1949 年在华法国人研究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伴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社会自由度的相对提高有利于在华外国人士或游历者与中国知识界进行更为广泛便利的交流。在所有的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中外知识界成立了协会，定期在各种聚会中碰面，互邀至家中做客，在工作中频繁接触，相互交流信息、书籍、文献和意见看法。知识分子间建立起来的友谊使得一些从未见之于世的资料得以被了解和使用。外国人与中国人这种新的交往方式极为深刻地改变了懂汉语的法国人的研究环境。在中国，这样的人仍然相对较少，但即使这样，其数量也比在法国本土要多。所以，1912 年到 1949 年间，法国关于清朝最优秀的研究都出自移居中国的法国人之手，且多数在中国出版。事实上，在中国出现的法语报纸和刊物也在出版论著和丛书。有些致力于为当地懂法文的读者服务的法国出版社和书店甚至拥有数千潜在客户。② 与之相似，在河内的法国知识精英和讲法语的越南及外国文人学者也会经常与在华法国知识界联系，尤其是通过查理·迈邦的《印度支那杂志》（*Revue indochinoise*）。

在中国居住和游历的法国人也发表了一些涉及古迹、清朝建筑以及艺术品的研究。③ 他们

摩伦：《法国在华耶稣会功绩史，1534-1928》（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 *L'épopée des jésuites français en Chine (1534-1928)*, Paris, 1928）；摩伦：《中国近代戏剧与音乐，兼论中国音乐的技术研究与钢琴改编》（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 *Théâtre et musique modernes en Chine: avec une étude technique de la musique chinoise et transcription pour piano*, Paris, 1926）；摩伦：《中国针灸术》（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 *L'Acupuncture chinoise*, Paris, 1939-1941, 2 volumes (édition complétée en 5 volumes, Paris, 1957)）。

① 马古礼：《中国艺术散文的演变》（Georges Margouliès, Évolution de la prose artistique chinoise, Vienne, 1929）；马古礼：《中国文学选集》（Georges Margouliès, *Anthologie raisonné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aris, 1948）；马古礼：《中国文学史：散文》（Georges Margouliè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rose*, Paris, 1949）；马古礼：《中国文学史：诗歌》（Georges Margouliè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oésie*, Paris, 1951）。

② 这些报纸包括：北京的《北京政闻报》（*La politique de Pékin*，1914 年到 1941 年出现的插画周刊）和《北京新闻》（*Journal de Pékin*，法语北京日报，1910 年到 1940 年发行，创办人阿尔贝·纳什布尔（Albert Nachbaur）同时也担任该报编辑）；上海的《中法新汇报》（*L'Echo de Chine*，1897 年到 1927 年发行的日报和周报）和之后的《上海日报》（*Journal de Shanghai*，1927 年到 1940 年发行的法文报纸）。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基本都在 1000 份左右，同时也会以《北京政闻报丛书》和《中法新汇报丛书》为名出版一些著作和小册子。1919 年，弗朗西斯·魏智（Francis Vetch，1862-1944）在北京饭店开设了一间法文图书馆，1921 年在天津设立分馆，这个图书馆同时也出版与文学、艺术和历史相关的法文书籍。他的儿子亨利·魏智（Henri Vetch，1898-1978）于 1920 年来到中国，更为积极地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直到 1951 年 3 月被监禁并最终于 1954 年 3 月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关于这段历史，参见雷强：《亨利·魏智及其北京法文图书馆》，《图书资讯学刊》2013 年第 2 期，第 149-194 页。天主教传教士的出版机构，如北京遣使会的北堂印书馆和耶稣会在献县和上海（土山湾印书馆）的出版机构，也出版了一些法语书籍和期刊。他们登载历史类文章和文献的主要刊物是《北京天主教通报》（*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北京发行，1913-1948 年）、《天主教通报》（ *Le Bulletin catholique*，天津发行，1918-1923 年）、《日本和中国传教团》（*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北京发行，1916-1942 年。从 1936 起改为在上海出版，1933-1934 年第 11 期开始更名为《中国传教团》）和《震旦大学通报》（*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上海发行，1903-1952 年）。

③ 安德烈·迪博斯克（André Duboscq）就是其中一位作者。他的第一本书《在北京的天空下》（*Sous le ciel de Pékin*）1919 年在巴黎出版。此外还有查理·于贝尔（Charles Hubert）的相关研究，如 1912 年发表在《东部地理学协会通报》上的《清西陵》（Charles Hubert, "Les Si-ling ou tombeaux de l'Ouest",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l'Est,* 1912, pp. 16-37）以及 1912 年至 1914 年发表的系列文章《1908 年的北京》（Charles Hubert, "Pékin en 1908",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l'Est,* 1912, pp. 107-136；1913, pp. 119-147, 219-239；1914, pp. 5-27）。以图片和文献的丰富程度来看，参加过义和团战争的海军军官斯塔尼斯拉斯·米约（Stanislas Millot）的《1901 年 4 月的北京和皇宫，附十六幅古迹和风光图》（Stanislas Millot, *Pékin et ses palais en avril 1901, avec 16 vues de sites et momuments*, Paris, Leroux, 1916）与殖民地部队军官路易·卡尔波（Louis Carpeaux，其父为著名雕塑家）的著作《消逝的北京》（Louis Carpeaux, *Pékin qui s'en va*, Paris, Maloine, 1913）同样应纳入考量。印度支那地区的中国研究著作也不容忽视，如奥古斯特·卜尼法西（Auguste Bonifacy）1931 年在河内出版的《论收藏在法国远东学院反映 1884-1885 年中法战争各场景的中国绘画作品》（Auguste Bonifacy, *A propos*

翻译了清代文人的出游札记。[①] 其中最出色的要数铁路工程师普意雅（Georges Bouillard, 1862-1930）关于历史建筑的系列论著《北京及其周边》（*Péking et ses environs*）。书中介绍了各建筑物的建造及其用途沿革，详细描绘了它们的当前状态，辅以相关文献的翻译、照片、插图、地图、平面图和测绘地形图。[②] 驻扎在中国二十年之久的殖民军步兵上尉莫里斯·法布尔（Maurice Fabre）1937 年在天津出版的《北京及其皇宫、寺庙与周边》（Pékin*, ses palais, ses temples et ses environs*）则是完整的北京历史和情况指南，且附有大量插图。

1921-1924 年，一个中法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编订出版了期刊《中国》（*La Chine*）。这份杂志主要翻译评介清代的文学著作，尤其是蒲松龄的故事集以及一些戏剧作品。《北京政闻报》也在丛书合集中出版蒲松龄的作品。[③] 与此同时，对中国文学体裁的评析研究也相继发表。[④]

迪博斯克和法夫尔（Favre）等在华学者大胆勾勒了清朝社会史。[⑤] 乔治·科尔迪埃在云南生活了二十年，他在离滇赴任印度支那司法服务翻译部门的负责人之际，发表了对云南穆斯林的原创性考察和综合研究。[⑥] 法国驻天津领事馆主事西居雷（Siguret）出版了清朝不同学者对云南北部边地问题研究报告汇编的法语译本，并附有注解、索引和地图，从而为法国学者细致研究过的这个省份增添了历史人类学维度的考察。[⑦]

查理·迈邦和让·弗雷代（Jean Fredet）撰写了上海法租界至 1875 年的历史（预定出版的第二卷未问世），掺杂众多细节和轶事，但主要是行政事务和事件描述，最有用的还是其中转录的当地文献。[⑧] 身在中国的其他学者或致力于出版涉及中欧关系史的未刊法文文献，[⑨] 或是进行中国本国史和反映当时中国人思想的文本的翻译，如《石达开日记》的翻译，[⑩] 及中国政府的法国顾问让·埃斯卡拉（又译作让·爱斯嘉拉）（Jean Escarra）和乔治·巴杜（Georges Padoux）出

---

d'une collection de peintures chinoises représentant divers épisodes *de la guerre franco-chinoise de* 1884-1885 *conservées à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Hanoi, 1931）。

① 让·R. 贝兰：《北京庙宇游记，麟庆出游札记选段》（Jean R. Baylin, *Visite aux temples de Pékin; extraits du carnet de voyage de Lin K'ing*, Pékin, 1921 (réédition augmentée, 1929)）。作者翻译的就是满族作家麟庆（1791-1846）的《鸿雪因缘图记》。

② 普意雅：《北京及其周边》（G. Bouillard, *Péking et ses environs*, Pékin, Albert Nachbaur éditeur, 1921-1925, 12 fascicules）。丛书研究的建筑包括天坛、清代皇陵、雍和宫和静明园。

③ 潘敬、辜鸿铭译：《中国故事》（*Contes chinois,* traduits par Panking et Kou Hong-ming, Pékin, 1924 (collection "La Politique de Pékin"）。1925 年，路易·拉罗依（Louis Laloy）在巴黎出版了《蒲松龄中国古代文本中的神奇故事》（Louis Laloy, *Contes magiques d'après l'ancien texte chinois de P'ou Soung-Lin, Paris,* 1925），应该是这本北京出版译作的再版。

④ 王 S.T. ：《清代中国轶闻史》（Wang S.T., *L'histoire anecdotique chinoise sous les Tsing*, Pékin, 1924），这本书被《北京政闻报》丛书收录；约瑟夫·许恩斯：《说部甄评》（Joseph Schyns, *Romans à lire et romans à proscrire*, Tientsin, 1946）。

⑤ 安德烈·迪博斯克：《中国精英的起源及其在帝国后来的转变》（André Duboscq, *L'élite chinoise, ses origines, sa transformation après l'empire*, Paris, 1945）; 伯诺瓦·法夫尔：《中国秘密会社的起源、历史作用和现状》（Benoît Favre,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en Chine: origine- rôle historique – situation actuelle*, Paris 1933），法夫尔是一名中国驻军军官。莫里斯·亚当：《从〈日下旧闻考〉看北京地区的风俗习惯》（Maurice Adam, *Us et coutumes de la région de Pékin, d'après le Je sia kieou wen k'ao*, Pékin, 1930）。这是偏重民族志角度的考察。

⑥ 乔治·科尔迪埃：《云南的穆斯林》（Georges Cordier, *Les Musulmans au Yunnan*, Hanoi, 1927）。

⑦ J. 西居雷：《云南边境版图及居民》（J. Siguret, *Territoires et populations des confins du Yunnan*, Pékin, 1937-1940, 2 volumes）。这部著作的中文版于 1933-1934 年在云南府（昆明）出版。

⑧ 查理·迈邦，让·弗雷代：《上海法租界的历史》（Ch. B. Maybon et Jean Fredet, *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Changhai*, Paris, 1929）; 让·弗雷代：《开启中国：法国领事查理·德·蒙蒂尼》（Jean Fredet, *Quand la Chine s'ouvrait: Charles de Montigny, consul de France*, Shanghai, 1943）。

⑨ 查理·萨缪尔·德·贡斯当：《三次游历中国记闻（1779-1793）》（Charles Samuel de Constant, *Récit de trois voyages à la Chine* (1779-1793)*: passages choisis et annotés par Philippe de Vargas*, Pékin, 1939）。

⑩ 石达开：《石达开日记：太平天国战争的一些片段》（Shih Ta-k'ai (1831-1863), *Le journal de Che Ta-k'ai épisodes de la guerre des Tai-ping: traduit par Li Choen*, Pékin, 1927）。这本书由李顺翻译，也被收录在《北京政闻报》丛书中。

版的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专论。[①] 这两位专家长期在华为历届中国政府服务，帮助其进行法律和财政改革。他们在北京和法国都发表了许多研究著作，不仅向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揭示了清朝法律演变和实践的重要原则，以及它们与欧洲法律史相比所展现出的一致性和差异，还指出了清朝律法在许多领域丰富法学普遍理论的潜在可能性。[②] 这些著作很快就有了英文和中文译本。

法国耶稣会、遣使会传教士和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以他们的期刊和印书馆为支撑，继续在北京、上海、献县和香港出版关于清代的学术型历史著作。[③] 其中一些研究探讨的是城市，特别是清朝城市的历史和地形地貌。[④] 另外一些则是清帝国历史地理工具书。[⑤] 有些作者将他们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实际观察和研究汇集成书，比如萨维纳（Savina）对苗族的探讨。[⑥] 还有一些作品则是思想史——清代研究的新领域——方面的文献翻译和注释汇编，[⑦] 或对新近思想演变的新颖综述。[⑧] 在这当中，布莱斯神父（P. Guy Boulais）翻译并解释清朝法典和判例的《大清律例便览》（*Manuel du code chinois*）贡献极大。[⑨] 耶稣会士禄是遒（Henri Doré）的《中国民间信仰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系列基于作者长期的实地考察，配以插图和大量文献资料（包括原始文本及其翻译），从民族志和历史角度对中国各地宗教和民间信仰进行了详细描述。[⑩] 这部书一直都是清朝宗教实践和民间信仰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此外，管宜穆神父也对中国对外宗教事务的文献进行了翻译和评述。[⑪]

得益于在中国定居的细心学者和杰出汉学家的论著，在华天主教传教史成为极受欢迎的研究主题。这种研究的成果多是意在以皈依人数突出传教事业成效的编年史，但其贡献在于对大量地方保存档案和文献的援引使用。原始资料往往很快消失不见，只剩下这些研究中引用的片

---

①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Leang K’i-tch’ao, *La conception de la loi et les théories des légistes à la veille des Ts’in. Extrait de l’Histoire des théories politiques à la veille des Ts’in*. Traduction, introduction et notes par Jean Escarra et Robert Germain. Préface de Georges Padoux, Pékin, 1926）。此书由让·埃斯卡拉与罗贝尔·热尔曼（Robert Germain）译注评介，乔治·巴杜作序。

② 在这其中，主要有让·埃斯卡拉：《中国法：观念与演变，立法与司法机构，科学与教育》（Jean Escarra, *Le droit chinois, conception et évolution, institutions législatives et judiciaires, science et enseignement*, Pékin/Paris, 1936）；让·埃斯卡拉：《外国人在华租界制度》（Jean Escarra, *Le régime des concessions étrangères en Chine*, Paris, 1929）；让·埃斯卡拉：《中国与国际法》（Jean Escarra, *La Chin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aris, 1931）。

③ 参见 139 页脚注②。

④ 尤其是于纯璧附有很多插图的巨著。于纯璧：《北京：王权的威严》（Alphonse Hubrecht, *Grandeur et suprématie de Péking*, Pékin,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1928）。

⑤ 顾赛芬：《中国地理：古代与近代》（Séraphin Couvreur S.J., *Géographie ancienne et moderne de la Chine*, Xianxian,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17）；马德赉：《1911 年中国各府天主教图》（Joseph Tardif de Moidrey S.J., *Carte des préfectures de Chine et de leur population chrétienne en* 1911, Shanghai, Imprimerie Tou-sé-wé, 1913）。

⑥ 弗朗索瓦·玛丽·萨维纳：《苗族史》（François Marie Savina, *Histoire des Miao*, Hong Kong, 1924）。作者在苗寨生活了四十年。1911 年到 1939 年，他出版了十二本苗语字典词典，多篇文章和一本文献质量上乘的书籍。虽然作者在处理中文历史文献时已经进行了严格的批判考证，但他的解释却常常因其宗教信念而错漏百出。关于萨维纳和其他在中国南方的传教士与法国官员的民族学研究，参见让·米寿：《“偶然的”民族志学者：云南与东京边境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团（1880-1930）》（Jean Michaud, *‘Incidental’ Ethnographers: French Catholic Missions on the Tonkin-Yunnan Frontier,* 1880-1930, Leiden, 2007）。

⑦ 戴遂良（又译作戴遂量）：《中国宗教信仰与哲学观点通史》（Léon Wieger, S.J., *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 depuis l’origine jusqu’à nos jours*, Xianxian, 1917 (2e édition augmentée 1922)）。

⑧ 毕保郊：《中国近 50 年哲学思潮（1898-1950）》（Octave Brière, S.J., *Les courant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 depuis 50 ans (1898-1950)*, Shanghai, 1949）。

⑨ 布莱斯：《大清律例便览》（Guy Boulais, S.J., *Manuel du code chinois*, Shanghai, 1924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 55)）。

⑩ 这部十九卷本的著作被收录在《汉学文集》（*Variétés sinologiques*）中，从 1911 年到 1938 年陆续在天主教传教团印书馆印刷，于上海出版。

⑪ 管宜穆：《中国与外国宗教：教务纪略》（Jérôme Tobar, S.J., *La Chine et les religions étrangères: Kiao-Ou Ki-lio*, (Résumé des affaires religieuses), publié par ordre de S. Exc. Tcheou Fou, Traduction, commentaire et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17）。

段向后人述说着当地丰富多样却缺乏记载的民众生活。它们涉及的不仅有早期耶稣会传教团，如在江南、献县的耶稣会群体，还包括广西、广东和四川的外方传教会以及镇江、正定、宣化和北京的遣使会传教团。①

其中，布鲁（Brou）以文集的形式发表了关于传教团重组的研究以及 19 世纪以来到过中国的耶稣会士的传记。费赖之（Pfister）则撰写了一部记录 19 世纪之前来华耶稣会士生活和传教成果的工具书。不过这部著作有一部分在 1891 年芜湖传教团遭遇火灾时被焚毁，直到作者去世很久之后才在孔道明神父（de Lapparent）和徐家汇传教团汉学部的支持下得以增补出版。②

遣使会所做的是为他们的传教士及其在华出版物建立索引目录③，一同被收入的还有1870年到 1900 年间各个大事件的相关记载和文献资料。④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遣使会史家包世杰（Jean-Marie Planchet, 1870-1948, 又译作包士杰）连同方立中（van den Brandt）、于纯璧和迪维尼奥（Duvigneau）一道，以笔名 A. 托马斯（A. Thomas）出版了两本北京传教史，使用丰富详尽的文献对耶稣会进行了猛烈抨击。⑤1939 年，于纯璧的著作对其进行了补充。⑥

外方传教会在档案管理员陆南（Adrien Launay）的倾力推动下出版了 1658 年以来教团传教

---

① 史式徽：《耶稣会在华早期传教团，1552-1914》（Joseph de La Servière, S.J., *Les anciennes mission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Chine, 1552-1914*, Shanghai, 1924）；史式徽：《江南传教史》（Joseph de La Servière, S.J.,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Zika-wei,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1914, 2 volumes）；史式徽：《江南新传教团（1840-1922）》（Joseph de La Servière, S.J., *La nouvelle mission du Kiang-nan* (1840-1922), Shanghai, 1925）；路易·埃尔芒：《江南（1842-1922）与南京（1922-1932）传教进程》（Louis Hermand, *Les étapes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1842-1922 et de la mission de Nanking 1922-1932*, Shanghai, 1933）；徐家汇汉学部：《大清江南的中国教士》（Zi-Ka-Wei. Bureau sinologique, *Clergé chinois au Kiang-nan sous les Ta*-tsing, Shanghai, 1933）；皮埃尔·梅尔滕斯：《中国的金色传奇：东南直隶传教团生活场景》（Pierre Mertens, S.J., *La Légende dorée en Chine: scènes de la vie de mission au Tche-li sud-est*, Lille, 1920）；约瑟夫·屈埃诺：《在黑旗军的故乡：广西传教团》（Joseph Cuenot, *Au pays des Pavillons-noirs: la mission du Kouangsi*, Hong Kong, 1925）；陆南：《中国传教史：广东传教团》（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Kouang*-tong, Paris, 1917）；陆南：《中国传教史：四川传教团》（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Se-tchoan*, Paris, 1920, 2 volumes）；冯烈鸿：《传教生涯：回忆与记述》（Cyprien Aroud, *La vie en mission: souvenirs - récits*, Vichy, 1935）；A. 莫雷利：《正定府教区史录》（A. Morelli, *Notes d'histoire sur le vicariat de Tcheng -Ting-Fou 1858-1933*, P'ei-P'ing, 1934）；包世杰：《宣化府的遣使会传教士（1783-1927）》（Jean-Marie Planchet, *Les Lazaristes à Suanhuafou, 1783-1927*, Pékin, 1927）；包世杰：《栅栏天主教徒墓地及他们的功绩》（1610-1927）》（Jean-Marie Planchet, *Le cimetière et les œuvres catholiques de Chala, 1610-1927*, Pékin, 1928）。

② 亚历山大·布鲁：《百年传教史（1815-1934）：19、20 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Alexandre Brou, S.J., *Cent ans de missions*. *1815-1934*. *Les jésuites missionnaires au XIXe et au XXe siècle*, Paris/Besançon, 1935）；费赖之：《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传略及书目提要（1552-1773）》（Aloys Pfister, S.J.,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Shanghai, 1932-1934, 2 volumes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59-60)）。

③ 方立中：《1697-1935 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Joseph van den Brandt, *Les Lazaristes en Chine, 1697-1935, notes biographiques recueillies et mises à jour,* Peiping, 1936）；方立中：《1864-1930 年北京遣使会印书馆主要刊印书籍目录》（Joseph van den Brandt, *Catalogue des principaux ouvrages sortis des presses des Lazaristes à Pékin de 1864 à 1930,* Pékin, 1933）；方立中：《1900 年之前北京和北直隶教区中国教士传略》（Joseph van den Brandt, *Le clergé chinois du diocèse de Pékin et du Tche – li Nord jusqu'à 1900 : essai de notices biographiques,* Pékin, 1942）。

④ 于纯璧：《惊人大屠杀中的天津殉难者（1870 年 6 月 21 日）》（Alphonse Hubrecht, *Une effroyable hécatombe: les martyrs de Tientsin (21 juin 1870), d'après des documents contemporains*, Pékin, 1928）；莱昂·亨利：《1900 年北京北堂被困记：保罗·亨利舰长和他的 30 个船员》（Léon Henry, *Le siège du Pé-t'ang dans Pékin en 1900, le commandant Paul Henry et ses trente marins*, Pékin, 1921）；包世杰：《庚子北京殉难录》（Jean Marie Planchet, *Documents sur les martyrs de Pékin pendant la persécution des Boxeurs*, Pékin, 1922-1923, 2 volumes）。

⑤ A. 托马斯：《北京传教史：从最初到遣使会的到来》（A. Thomas,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rrivée des Lazaristes*, Paris, 1923）；A. 托马斯：《北京传教史：从遣使会到来至义和团起义》（A. Thomas,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depuis l'arrivée des Lazaristes jusqu'à la révolte des Boxeurs*, Paris, 1925）。

⑥ 于纯璧：《遣使会士与北京传教》（Alphonse Hubrecht, *La Mission de Péking et les Lazaristes*, Pékin, 1939）。

士传略及著作目录汇编。① 一些杰出传教士的传记也得以发表，这些类似于圣徒传记的写作使用了大量文献，比如由光若翰（de Guébriant, 1860-1935）的亲信传教士撰写的这位主教的传记就属于这种类型。② 天主教女修会也在做同样的工作。不过，外方传教会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对《李安德日记》（*Journal d'André Ly*）的再版。③ 这部以拉丁文撰写、长达 831 页的手稿保存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档案馆，作者是一位曾在暹罗传教士神学院接受过教育，后在四川工作近四十年的中国神父。陆南发现了这部手稿，认为它语言生动，内容异常丰富，趣味十足。书稿最终于 1906 年在巴黎出版，陆南还用当时传教士的书信为其做了注解，且加入了注释和索引。这部书的再版引起外方传教会主教阿尔芒·奥利琼（Armand Olichon）的注意。他出版了一本通俗历史书籍，引发了公众对这位中国神父的关注，奥利琼主教以此参与到天主教内部的激烈争论中，倡导在中国建立教会等级体系来代替外国传教士。不仅如此，李安德这位中国神父在当时知识背景下所接受的的信仰教育和神学思想也成为学者的研究主题。④

在 1912 年到 1949 年间所有与清代相关的传教士著作中，最具创新性的要数耶稣会士、数学家与哲学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Maître, 1889-1975）的研究，其主题是 17 世纪中国人与耶稣会士在文化和科学领域的交流。这位作者在中国和欧洲发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献，并将之翻译、加注和出版。他试图藉此说明，起源于中国近代时期的思想批判运动并非如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认定的那样始于 1917 年的新文化运动，也不是发端于戊戌变法或 19 世纪改革的失败尝试。它的源头应该可以追溯至更早，人们能够从 17 世纪开始基督教人文主义和欧洲科学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中发现端倪。中国的决定性转变与欧洲近代思想的形成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裴化行的众多著作和文章都在竭力论证这一重要的基础，但并不触及中国批判思想直到 20 世纪的发展演变问题。⑤

---

① 陆南：《外方传教会回忆录》（Adrien Launay, *Mémorial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is, 1912-1916, 2 volumes）。这是 1660 年至 1912 年所有到中国、越南或其他国家的传教士的自传目录。

② 奥古斯特·弗拉谢尔：《传教士光若翰主教传》（Auguste Flachère, *Monseigneur de Guébriant: le missionnaire*, Paris, 1946）。

③ 陆南：《李安德日记：中国神父、传教士和教廷公证人（1746-1763）》（*Journal d'André Ly, prêtre chinois, missionnaire et notaire apostolique, 1746-1763. Texte latin. Introduction par Adrien Launay*, Hong Kong, 1924）。

④ 阿尔芒·奥利琼：《中国教士的缘起：四川传教士李安德神父（1692-1775）》（Armand Olichon, *Aux origines du clergé chinois: Le Prêtre André Ly missionnaire au Se-Tchoan (1692-1775)*, Paris, 1933）。这本书获得了 1934 年法兰西学术院大奖。让 - 玛丽·塞德斯：《一个司铎的灵魂：中国神父李安德（1672-1775）》（Jean-Marie Sédès, *Une âme sacerdotale: le prêtre chinois André Ly (1672-1775)*, Paris, 1943）。

⑤ 这位作者最初名为亨利·贝尔纳，从 1948 年开始被称呼为亨利·贝尔纳 - 迈特尔。这里只列举他的主要著作。关于他撰写的与中国相关的文献目录，参见 1976 年耶稣会士 J. 德埃尔涅（J. Dehergne）发表在《法国远东学院通报》上的文章，http://www.persee.fr/doc/befeo_0336-1519_1976_num_63_1_3897，2018 年 7 月 23 日。其著作主要有裴化行：《利玛窦神父对中国科学的贡献》（Henri Bernard, S.J., *L'apport scientifique du Père Mathieu Ricci à la Chine*, Tientsin, 1935）；裴化行：《中国智慧与基督教哲学：论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Henri Bernard, *Sagesse chinoise et philosophie chrétienne, essai sur leurs relations historiques*, Tientsin, 1935）；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与其时的中国社会》（Henri Bernard, *Le Père Mathieu Ricci et la Société chinoise de son temps*, Tientsin, 1937, 2 volumes）；裴化行：《19 世纪前西方文化对满洲和朝鲜的影响》（Henri Bernard, *En Mandchourie et en Corée : influence culturelle de l'Occident avant le XIX siècle,* Tientsin, 1940）；裴化行：《洪若翰神父中国和暹罗游历记（1685-1687）》（Henri Bernard, *Le voyage du Père de Fontaney au Siam et à la Chine, 1685-1687, d'après des lettres inédites*, Tientsin, 1942）；汤若望著，裴化行编：《中国历法修订时期大事纪略》（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Relation historique des événements qui se produisirent à l'occasion de la correction du calendrier chinois. Lettres et mémoires, édités par Henri Bernard. Texte latin avec traduction française*, Tientsin, 1942）；裴化行：《欧洲著作的中文编译目录（以时间为序）：从葡萄牙人到广州至法国传教团到北京（1514-1688）》（Henri Bernard, *Les adaptations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éens. Bibliographie chronologique depuis la venue des Portugais à Canton jusqu'à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g 1514-1688*, Pékin, 1945）。